

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我国城市社会的均衡分配体制被打破,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城市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生活水平出现下降,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状态。城市贫困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正日渐凸现。虽然城市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并不算大,贫困的程度也不及农村,但城市人口集中,作为交通,信息的枢纽,贫困问题造成社会摩擦和社会影响较之农村要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龙头,如何正确的面对社会问题,有效的解决城市贫困,在让高收入人群先富起来的同时,保障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入的基本生活权利,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从社会学和社会地理学的角度,对南京的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研究。在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对城市贫困和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基础上,依据社会分层、社会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分异、以及空间分析与社会调查的理论方法,建立了对城市贫困阶层社会空间分析的研究框架。根据城市社会保障有关资料,及其隐含的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差异,选取了部分典型社区,对贫困的个人与家庭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对贫困阶层聚居的社区的了解,本文从贫困阶层的基本特征、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居住状况等方面,分析了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特点。结合城市的历史背景、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目前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转型时期的特征,探讨了南京城市贫困阶层产生社会机制,分析了贫困阶层的产生和空间分布,与城市经济结构、居住空间结构、城市环境、消费结构、和文化与心理结构之间的作用关系,并由此引申出对城市规划制度、住宅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有益启示。

关键词: 城市贫困 城市贫困阶层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南京

目 录

图录、表录

1 国内外城市贫困阶层研究进展	1
1.1 国外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	1
1.1.1 城市贫困的含义与界定.....	1
1.1.2 城市贫困阶层的界定.....	1
1.1.3 产生原因及贫富分化的趋势.....	2
1、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原因	
2、城市贫富分化的趋势	
1.1.4 城市贫困阶层的特征.....	6
1、城市贫困阶层的构成	
2、城市贫困阶层的生活际遇	
3、城市贫困阶层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1.1.5 城市贫困阶层的分布.....	8
1.1.6 国家与地方政府反贫困的政策措施.....	9
1.2 国内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	11
1.2.1 城市贫困阶层的特征与界定.....	11
1.2.2 城市贫富分异的差距.....	12
1.2.3 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阶层.....	13
1.2.4 关于现阶段我国是否存在底层群体.....	13
2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14
2.1 社会分层的理论.....	14
2.1.1 关于社会分层的解释.....	14
2.1.2 关于社会分层的标准.....	15
2.2 社会空间分异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	15
2.2.1 城市生态结构理论.....	15
2.2.2 新古典经济学与区位论.....	16
2.2.3 马尔克斯的城市空间理论.....	16

2.3 社会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理论.....	17
2.3.1 社会福利学派.....	17
2.3.2 马克思主义学派.....	18
2.3.3 城市管理学派.....	18
2.4 社会空间统计分析的方法.....	18
2.4.1 社会空间统计分析的方法.....	18
1、社会区分析与因子生态学方法	
2、社会福利函数的方法	
2.4.2 贫困阶层的社会空间分析.....	19
2.5 社会调查的方法.....	19
3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调查.....	21
3.1 城市贫困阶层的规模调查.....	21
3.2 城市贫困阶层的典型调查.....	21
3.2.1 调查地点.....	21
3.2.2 调查方法.....	21
4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社会空间分析.....	23
4.1 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	23
4.2 城市贫困阶层的基本特征.....	27
4.2.1 年龄与性别构成.....	28
4.2.2 受教育程度.....	28
4.2.3 职业构成.....	29
4.2.4 个人与家庭的致贫原因.....	29
4.3 城市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	30
4.3.1 消费水平与结构.....	30
4.3.2 购物与娱乐.....	31
4.4 城市贫困阶层的居住状况.....	32
4.4.1 居住水平.....	32
4.4.2 居住需求.....	33
4.4.3 居住典型地区.....	34

1、评事街——旧城区的贫困阶层	
2、梅园——市中心的贫困阶层	
3、中华门、中山桥——城市边缘区的贫困阶层	
4、荷花塘——特殊的贫困阶层	
5 南京市贫困阶层产生的背景与社会机制	38
5.1 南京市历史与社会经济背景分析	38
5.1.1 城市历史背景	38
1、人口历史背景	
2、住宅建设历史背景	
5.1.2 城市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	38
5.2 南京市贫困阶层产生的社会机制	40
5.2.1 产业结构转型与城市失业下岗	41
5.2.2 劳动力市场转变与流动人口	42
5.2.3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城市贫困结构转化	42
6 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	44
6.1 城市贫困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44
6.2 城市贫困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形成	46
6.2.1 城市贫困与城市居住空间分异	46
6.2.2 城市贫困与城市传统居住空间	47
6.3 城市局部环境的恶化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48
6.4 城市贫困与地区消费结构差异	48
6.5 城市贫困与社会文化与心理结构	49
7 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规划及发展政策的启示	51
7.1 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规划公平性的启示	51
7.2 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住宅政策的启示	51
7.3 城市贫困阶层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启示	52
参考文献	54
致谢	58

附录.....	59
1 调查表格式.....	59
2 南京各城区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构成.....	62
3 基本统计数据库.....	63

Not For Distribution

图录、表录

图 1-1	贫困的恶性循环.....	3
图 1-2	贫困的生产关系网络.....	5
图 1-3	1991 年美国一些群体的贫困率.....	6
图 1-4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实现基本模型.....	8
图 1-5 a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	9
图 1-5 b	霍伊特的扇型模式.....	9
图 1-5 c	哈里斯—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	9
图 1-6	西方国家的福利模式.....	11
图 2-1	城市居民收入的空间分布.....	16
图 2-2	城市贫困阶层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17
图 3-1	南京市贫困阶层调查地点示意图.....	22
图 4-1	南京市街道辖区示意图.....	24
图 4-2	南京市贫困阶层分布示意图 (a).....	25
图 4-3	南京市贫困阶层分布示意图 (b).....	26
图 4-4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年龄结构.....	28
图 4-5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性别构成.....	28
图 4-6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消费支出状况.....	31
图 4-7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购物场所选择.....	31
图 4-8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住房来源.....	33
图 4-9	晚清时期的评事街.....	34
图 4-10	梅园新村的住宅.....	34
图 4-11	梅园 11 号内的一家三口, 和年久失修的 10 平方米小屋.....	35
图 4-12	西街的街景.....	35
图 4-13	荷花塘 4 号——五进穿堂的老宅, 内住 10 户人家.....	37
图 5-1	解放前南京市棚户区分布.....	39
图 5-2	南京市人口就业结构变动 (1990-1999 年).....	40
图 5-3	南京市社会救济人次变动 (1977-1989 年).....	43

图 5-4	南京市社会保障人数及构成变动 (1996-2000 年)	43
图 6-1	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相互作用示意图	44
图 6-2	南京私营、个体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1999 年)	45
图 6-3	南京城市低标准住宅分布示意图	47
图 6-4	钓鱼台高岗里 17 号——“九十九间半”内景	48
图 6-5	评事街内简陋的排水系统	48
图 7-1	五个 OECD 成员国的社会保障支出 1960-1991 年	53
表 1-1	沃纳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贫困阶层的特征	2
表 1-2	1979-1993 年美国家庭收入差异变化	5
表 1-3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各层占有收入的比例 1994 年和 1996 年	13
表 4-1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分区差异	23
表 4-2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	23
表 4-3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研究分类	27
表 4-4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文化程度	29
表 4-5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职业分布	29
表 4-6	家庭的致贫因素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	30
表 4-7	个人的致贫因素分析	30
表 4-8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住房类型	32
表 4-9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住房面积和设施	32
表 5-1	1934 年南京市无业人口统计	38
表 5-2	解放前南京市住宅分异状况	39
表 5-3	南京市历年人口增长	40
表 5-4	1985、1996、1999 年南京市工业从业人员和职工人数的结构变动	41
表 5-5	南京市分行业职工收入情况	41
表 6-1	城市贫困阶层的心理结构差异	49
表 7-1	城市居民获得住房的途径	52

一、 国内外城市贫困阶层研究进展

1.1 国外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

1.1.1 城市贫困的含义与界定

城市贫困作为长期困扰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吸引了西方社会学者近百年的关注。关于贫困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层含义。

绝对贫困 (Absolute Poverty) 是指人们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满足不了基本生存的需要。在早期的城市贫困研究中 (见 Booth, 1889, Rowntree, 1901), 采用的均为绝对贫困的概念, 即根据人们实际收入水平, 拥有的消费资料和得到的服务, 折算成货币单位进行测量。这类综合指标体系被广泛用于制定社会福利与发展政策。

当社会制度不断变更, 尤其社会更加富裕后, 人们对基本生存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相对贫困 (Relative Poverty) 的概念应运而生, 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 收入虽能达到或超过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 但相比较仍处于较低生活水准的人群。当代西方社会的城市贫困现象, 更大程度上是“富裕中的贫困”, 即相对贫困。

国外对于一定区域范围的城市贫困人口, 一般采取贫困线或社会福利工作对象的方法 (Mingione, 1996)。贫困线 (Poverty Line) 是以个人与家庭的经济来源与收入状况为标准, 对贫困人群做出划分。根据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含义, 贫困线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从绝对的物质指标去衡量的绝对贫困线, 另一种是从社会其他成员生活水平中测量的相对贫困线, 例如社会成员平均收入的 50%。由于贫困线的标准过于绝对, 可能忽视部分人群的隐性收入来源, 以及城市内部与边缘的生活水平差异等影响要素, 在实际研究中, 该方法往往不能反映真正的贫困者。

根据社会福利项目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 的救助范围, 也可以掌握城市贫困人群的数量, 并从相关的历史记录资料中, 了解个人致贫的原因。由于各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存在很大差异,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也具高度多样性与选择性, 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 尤其区域比较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1.1.2 城市贫困阶层的界定

城市贫困阶层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人群。美国社会学家沃纳采用五等份法, 将社会分成五个阶层 (Warner, 1949), 其中下层阶级 (Lower Class) 由社会中离财富、权力和声望最远的人构成, 具体分为两个社会阶层——“上下层”与“下下层”。“上下层”即所谓的“蓝领阶层”, 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操作工人和装配工人等。“下下层”主要指那些无技术特长、文化水平低、从事非熟练工作的人, 和无固定收入、领取救济金的人 (见表 1-1)。在英国社会学家采取的阶级阶层划分方法中, 贫困阶层是位于非熟练工人阶级之下, 甚至游离

于阶层结构以外的部分人群，他们缺少社会参与和其他必要的生活机遇，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或边缘地位（Bilton, 1987）。

表 1-1 沃纳的社会分层结构中的贫困阶层

阶 层	一 般		声 望				权 力	
	收 入	财 产	职 业	职业声望	消 费	群 体 生 活	政 治 参 与	政 治 态 度
上下层 (工人阶级)	低收入	无固定资产	技术工人 无技术工人 失业率最高	低职业声望	消费水平低	较少参与		除少数民族外， 大多反对民权
下下层	贫困	无积蓄	失业率最高 剩余劳动力	无劳动力价值	物质匮乏，强烈的经济上的焦虑	社会隔离者	倾向于不参与投票等政治行为	支持更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及政府的经济援助与安全计划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底层阶级”（Underclass）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表明城市中存在一个特殊的贫困者阶层，他们被排斥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结构以外。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瑞典学者米达尔（Gunnar Myrdal, 1963），他认为在美国大城市中，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产生了一个有别于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他们大多是无业者、无劳动能力者，或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处于劣势的就业者。70 年代末期，底层阶级成为描述黑人贫困者，及其犯罪行为和其它越轨行为的专门术语。理查德·内森（Nathan, 1987）在调查了百座大城市后，提出了底层阶级的两种界定方法。广义的定义包括城市中所有生活贫穷的居民，他们缺乏技术资格或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只有有限的联系，狭义的定义仅仅包括贫困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人，他们生活在集中的贫民区内，占城市人口的 5%至 10%。社会学家威廉·威尔逊（William J. Wilson, 1978; 1987）曾对底层阶级做了大量研究，他认为民权运动和郊区化的趋势，很多中高收入的少数民族离开了城市的城区，留下的人则处于“社会孤立”的状况，从而集中居住在“贫民窟”内，成为一个与社会脱节的底层阶级。

1. 1. 3 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原因及贫富分化的趋势

（一）、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原因

归根究底，资本主义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源于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城市贫困的解释也有所不同。

1、贫困的社会经济根源

马克思（K. Marx）在《资本论》中写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改进技术水平，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这部分相对过剩的人口包括流动过剩人口，潜在过剩人口，和停滞性过剩人口三种存在形式。其中停滞性过剩人口包含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失业者和贫民，如流浪者，丧失劳动力者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是城市贫困阶层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提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普遍发展规律。他认为

无论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何种状况，工人的命运都无法改变。“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而“在社会的生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马克思，1844）

2、社会学的解释

（1）个人与家庭的原因

英国的社会调查专家布思 (Booth, 1889) 曾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 19 世纪伦敦居民中贫困问题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布思的后继者朗特里 (B. Rowntree) 于 1901 年发表了《贫困：有关城市生活之研究》一书，成为社会学界研究城市贫困的先驱者。他通过生理学与营养学的研究，提出贫穷的直接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不能维持一定的“体力效力”，并将城市贫困的原因归结为个人工作收入的不足，失业，衰老，以及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丧失。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夫妇 (S. Webb, B. Webb) 在著作《贫困防止论》中进一步提出，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往往发生在以下人群中：(1) 疾病、早衰者；(2) 丧夫并要抚养孩子的寡妇；(3) 失去双亲和抚养者的孤儿；(4) 年老或因精神等原因不具备劳动能力者；(5) 长期失业者。英国医生哈里 (J. Harry) 则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学说”，如图 1-1 所示，他认为贫困是一种往复的恶性循环，贫困使个人、家庭及社会处于某种特殊状态，而这些状况将导致个人或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即“贫困产生贫困” (沈洁等，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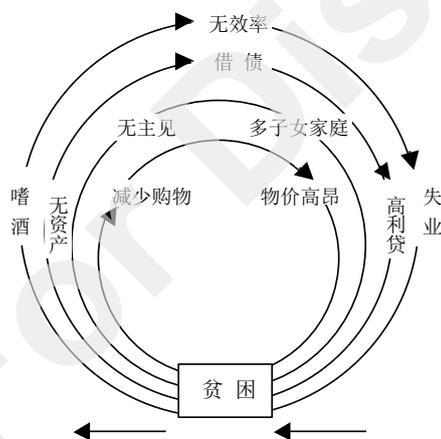


图 1-1 贫困的恶性循环

（2）贫困的功能解释

以社会学家帕森斯 (T. Parsons) 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系统，由各种社会角色构成，这些角色必须有人扮演，而且还要彼此协调一致 (Alexander, 1987)。因此，社会为了维持有效的均衡，对较为重要的社会角色，往往赋予较丰厚的报酬，以鼓励人们竞争参与，相反，对重要性较低的角色，则提供较少的报酬。一些人由于先天才能或受教育程度低下，只能从事重要性较低的职位，获取较少的社会报酬，以致成为贫困者或“穷人”。按照这种理论，贫困阶层的产生与存在，与富裕阶层的存在一样，是社会均衡发展的功能需要。

借用了社会功能主义的思想，美国社会学家甘斯（Herbert J. Gans, 1972）在 1972 年发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文章——《贫困的正功能》，认为贫困不仅具有反向功能，也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正向作用。例如穷人可以从事社会里各种“肮脏的工作”；穷人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提供各种职业，如警察、典狱人员、高利贷债主和烟毒贩子等等；穷人的存在使居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们通过种种慈善事业获得精神满足；在政治斗争中，穷人更是各政治团体意图笼络或排斥的对象。甘斯认为贫穷最终是可以消除的，但事实上贫困阶层仍将继续存在，原因在于：（1）对许多社会组织，贫穷可为他们提供工作对象，从而带来经济利益。（2）穷人承担了部分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3）即便存在可替代的项目，对于富人而言，穷人永远是代价最低廉的选择。

（3）产生贫困的社会制度结构原因

与功能学派相对立的社会冲突学派认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产生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本质。首先，他们认为所谓“均衡的社会体系”是不存在的，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广泛冲突的社会。其次，社会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组成，各群体对物质资源与信息控制权利不同，决定了各社会阶层的地位差别。在冲突学派看来，社会群体的利益争夺中，必然产生一些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合理，使他们无法脱离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的边缘，而长期陷入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窘迫状态，成为相对稳定的贫困阶层。

在著名的冲突主义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Dahrendorf）和柯林斯（R.Collins）的理论中，贫困阶层均处于权力等级的最低级，他们处于有限的社交网络，能够控制或获得的财富也有限，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体力劳动性质的。

3、当代社会地理学的解释

当代对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还有诸多解释，其中包括一些颇为新颖的观点。1996 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 L.Yapa 撰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贫困的解释：一种后现代的观点》。他认为早先对贫困的人口、社会、经济学解释是如此庞杂，以至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名词，或者是多重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产物（见图 1-2），这一广义的生产关系网络涵盖了技术，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以及学术思想等领域。

他倡导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地方化研究传统，认为当代贫困研究的意义在于与“地方性”结合，即探讨“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的贫困原因”。此后在对美国费城贫困社区的实证研究中，他具体讨论了费城非均衡的交通体系，地方消费结构的差异，以及独特的社区文化对费城贫困阶层和贫困社区的影响，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Yapa,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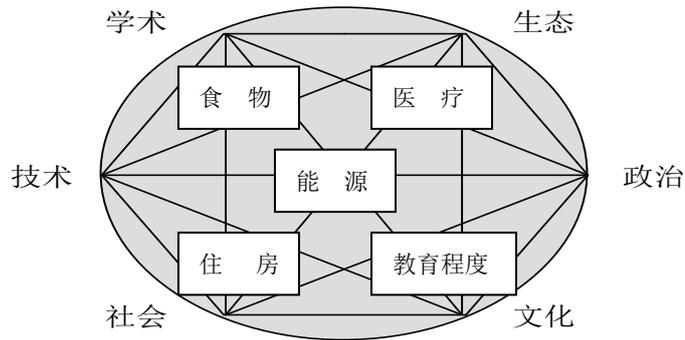


图 1-2 贫困的生产关系网络

The Nexu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Poverty

(二)、城市贫富分化的趋势

战后西方国家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贫富差距一度呈缩小趋势。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农业保护政策的推行，更是抑制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增长。然而 70 年代后期，欧美国家的城市贫困人口开始逐年扩大。其中以美国城市贫困的比重最大，贫富分化的程度最为严重。根据 70 年代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美国分成五个财富阶层，其中最富有的 1/5 的人口，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固定资产收入分别占国民收入的 42.7%和 76%，而最贫困的 1/5 人口的工资收入和固定资产仅占 4.7%和 0.2%。（奚从清等，1994）

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的贫富差异继续扩大。诺曼·费恩斯坦（Fainstein, 1996）对美国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家庭收入差异进行比较，得出美国近十多年贫富分化的趋势。如表 1-2 所示，大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实际上是更穷了，而贫富两端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

L.S.Bourne 对加拿大的研究发现，城市收入差异的扩大原因在于，（1）全球经济重建、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竞争加剧，西方国家对低技术人员的需求普遍降低。（2）新的人口状况出现，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提高，对年轻从业者的就业造成压力。（3）生活方式与家庭结构的转变，单亲家庭比例增长，出现一些以妇女就业为主的低薪岗位。（4）社会福利模式的转变，尤其税收和福利水平的降低，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表 1-2 1979-1993 年美国家庭收入差异变化

年份	1979/1980	1992/1993
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	0.403	0.447
各组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		
最高的 5%家庭	16.9	20.0
最高的 20%家庭	44.1	48.2
中等的 60%家庭	51.7	48.2
最低的 20%家庭	4.2	3.6
排列居中的家庭收入 (美元)	32143	31241

资料来源: Norman Fainstein, etc., A Note on Interpreting American Poverty,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1996

1.1.4 城市贫困阶层的特征

在欧美与发展中国家，导致城市贫困的原因不同，城市贫困阶层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一)、贫困阶层的构成

城市贫困阶层的构成复杂，各类人群都有可能成为贫困者 (Spencer, 1985)。按比例结构，儿童、残疾者、老人、在业的低收入者，和暂时性的失业者，以及少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个人，是主要的贫困者 (Steward, 1983)。

从就业特征角度，失业与在业低收入是导致欧美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欧洲国家由于劳动力普遍供大于求，就业保护程度较高，以及高福利政策等因素，城市贫困阶层中大多是主动失业者。而在美国，失业率已降到较低水平，但在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同时，劳动者的报酬几乎没有增加，当前城市贫困阶层中大部分是在就业的低收入者。

从年龄与性别特征，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Vulnerable Groups) 通常是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老年人由于无法继续就业而收入减少，医疗支出增加，容易陷入贫困。妇女则因雇佣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很难以就业来摆脱贫困。以贫困妇女为家长的单亲家庭和其他低收入家庭，往往影响到其未成年子女，甚至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近来对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年轻人正成为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主力军，约 45% 的社会救济对象为 18-44 岁的中青年，其中以 25-34 岁的比例最高，他们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面狭窄 (Zajczyk, 1996)。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贫困群体是外来移民。发达国家由于限制移民从事较好工作，大部分移民被迫就业于低技术、低收入的工种。同时，外来移民大多无法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福利待遇，一旦生活发生变故，往往很容易陷入贫困状况。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二元差别严重，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移民往往是城市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

由于种族歧视等原因，有色人种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99) 根据美国统计摘要，列举了各类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其中非洲裔美国人是 32.7%，拉美裔美国人是 28.7%，儿童是 21.1%，均远远高于总的 14.2% 的贫困率 (见图 1-3)。可见在当今美国社会，贫困更易发生在有色人种、外来移民和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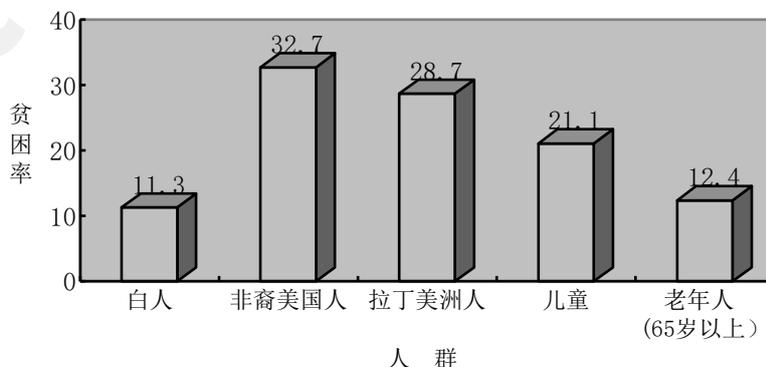


图 1-3 1991 年美国一些群体的贫困率

（二）、贫困阶层的生活际遇

从个人与家庭生活、工作、闲暇消遣等方面看，贫困阶层都享有较少的机会。以美国为例，贫困阶层成员的寿命较低，患病的比例较高。穷人通常缺乏适当的健康保险，问题最为严重的不是最穷的人，而是那些工作着的穷人和下层工人阶级，他们既没有资格享受社会福利的医疗补助，也买不起私人保险，却大多从事无健康保险的工作（波谱诺，1999）。

下层阶层的受教育机会也明显低于上层阶级，休厄尔（1971）对 9000 名学生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出身者的 2.5 倍。艾斯克洛德的研究表明（1956），下层阶级的人与阶级地位较高的人相比，社会参与的机会以及从中获得的好处较少。他们朋友较少，认识的邻居和同事较少，参加的团体较少，即很少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交往。

（三）、贫困阶层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1966）通过对墨西哥、波多黎哥贫民区的调查，在 50 至 60 年代提出了关于贫困文化（Poverty Culture）的著名理论。他认为贫困者由于脱离社会主流文化，往往表现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由于贫困阶层的内部交往，而得以强化并世代传递。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对美国黑人贫民区的研究中，发现贫困者的行为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有很大冲突，他们大多不愿自我奉献、努力工作、遵守法律规范和维持家庭的完整，在这种独特的亚文化氛围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不能建立积极的价值观念和人生信仰，导致物质生活的匮乏，和失败的人生经历”（Greenstone, 1991）。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很多学者对贫困文化，及其对代际传递的解释提出了质疑。首先，贫困者并不具有某种显著的行为特征，一项对 4000 人的抽样调查显示，贫困者与其它社会成员同样愿意积极参与工作并接受职业培训（Goodwin, 1972）。其次，贫困者的行为特征与价值观不一定影响子女的生活方式。罗伯特·霍尔曼（Holman, 1978）在英国的研究发现，大约 1/3 的贫困家庭的子女，婚后仍然是处于贫困状况，其余 2/3 并不贫困。对贫困家庭户主的兄弟姐妹的调查显示，149 人中有 66 人并不存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也从未依赖过社会福利。美国的案例调查也发现（Treadwell and Shaw, 1981），贫困家庭的孩子大约 10 个中有 5 个从事收入稳定的工作。

针对贫困文化的解释，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贫困的结构性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 of Poverty）。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等客观因素，例如权力、财富及其它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贫困在家庭中的世代传递。贫困家庭的后代由于身处社会底层，无法享有足够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因而在争取社会认同感与向上层社会流动时受挫，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Gans, 1971; Miliband, 1974）。

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P.Blau & O.D.Duncan, 1967）更为研究贫困的代际传递，建立了量化的分析框架，该模型可计算父母的教育与职业地位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程度，反映贫困的代际传递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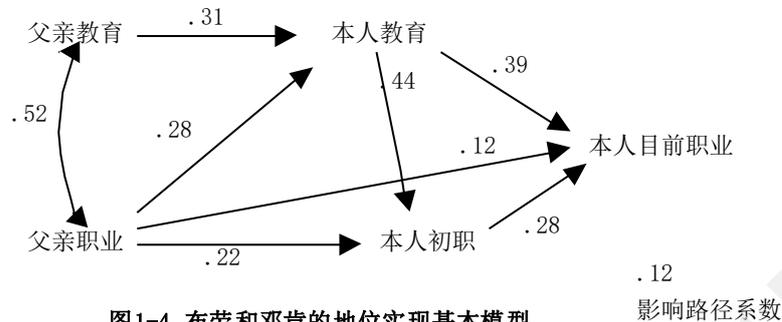


图1-4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实现基本模型

1.1.5 城市贫困阶层的分布

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特征始终是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研究兴趣所在，从早期的社会学研究，到近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均可见到与之有关的内容。

芝加哥社会学派最早以社会生态学方法对城市贫困阶层的分布做出研究。20 世纪 20-30 年代，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 (R. Clark) 对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如城市犯罪，贫民窟，移民区等就十分关注。他首先观察到城市居住区的社会同质性，并提出社会经济分层，文化、宗教、种族差异，与各社会群体的地理分布之间存在作用关系。

-----帕克的同事厄内斯特·伯吉斯 (E. Burgess, 1923) 提出了最早的城市地域结构理论——同心圆理论 (Concentric Zone Model)。他通过对芝加哥城市的调查，提出由中心向外缘五个层次的圈层地域结构。其中过渡地带 (Zone of Transition) 也称曙光地带，是紧邻中心商业区的混合地带，以下层阶级居民为主，集中了小型工厂，商店，低级破旧的住宅和一些贫民窟。(见图 1-5 a)

伯吉斯首次把城市按贫富区域划分开来，以便分别深入加以研究。他认为贫民区之所以集中在过渡地带在于，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工业化势头吸引了大批贫穷的欧洲移民，他们大多选择住宅低廉而且紧邻工厂区的地带落脚，由此产生“涟漪效应”，推动了早期移民，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和其它富裕阶层向城市外围的居住迁移。

-----霍伊特 (H. Hoyt, 1939) 通过对住宅租金的研究，发现美国城市居住区有向外延伸的趋势，高级住宅会受到事务区、高级饭店和社会名流的吸引，沿公路或河流延伸到市中心，而低级住宅区也可向外扩展到市郊。按霍伊特的解释，低级住宅区不完全呈同心圆状分布，随着高收入阶层的外迁，低收入阶层也可能搬入被弃置的原高级住宅区，并在其地域基础上形成扇形模式 (Sectoral Model)。(见图 1-5 b)

-----而在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和乌尔曼 (C. D. Harris & E. L. Ullman, 1945) 的多核心模式 (Multiple Nuclei Model) 中，城市具有两个以上的市中心，城市低级住宅区可能围绕中心商业区，重工业区等多个核心分布。(见图 1-5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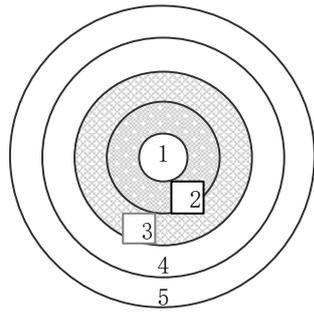


图 1-5 a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

1 中心商业区, 2 过渡地带, 3 工人居住带
4 良好居住地带, 5 通勤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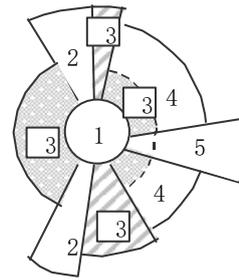


图 1-5 b 霍伊特的扇形模式

1 中心商业区, 2 批发商业、轻工业区,
3 低级住宅区, 4 中等住宅区, 5 高级住宅区

以上理论虽有差异,但基本上反映了英美城市按社会阶层分化形成的地域结构。大致而言,较富裕者一般居住于环境清静的市郊,而贫困者不能支付昂贵的交通费与房价,只能留在市中心附近的贫民窟。然而这些模式并不适用所有西方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些主要城市,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相对普及和郊区化的过度蔓延,出现贫困阶层由市中心向郊区分散的趋势 (Badcock, 1984)。

近年,在美国与欧洲,城市经济与社会空间的重组,或“士绅化”(Gentrification)趋势,也已影响到居住在市中心的贫困人群的生活空间。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郊区房价的昂贵,以及小规模家庭数目增多。其结果是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街区中穷人的位置被专业人士取代了”¹。“士绅化”带来了城市中心的复兴,城市贫民却无法担负改造后的房租,而失去原有居所,甚至成为无家可归者 (The Homel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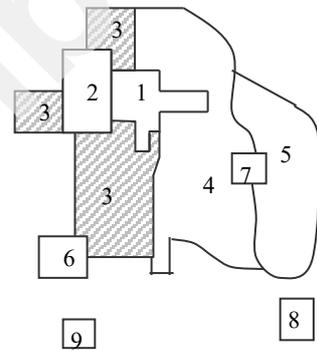


图 1-5 c 哈里斯-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

1 中心商业区 2 批发商业区、轻工业区
3 低级住宅区 4 中等住宅区 5 高级住宅区
6 重工业区 7 外用商业区 8 近郊住宅区
9 近郊工业区

1.1.6 国家与地方政府反贫困的政策与措施

当前世界贫困问题主要是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恶果,其中贫富差别的日渐扩大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突出表现 (钟鸣等, 1999)。各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缩小贫富差别尤其反城市贫困上,主要采取的是扩大就业与社会福利的政策措施。

(一)、扩大就业政策

失业问题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促进就业成为各国反对城市贫困的政策体系中重要一环。70年代末对荷兰、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玻利维亚、缅甸等发展中

¹ 见[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576页,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哪个经济发展阶段,政府鼓励部分产业发展,主动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都具有“平衡效应”,能促进收入的均衡分配(Stack, 1978)。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在城市中开展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环境改造工程,能为社会提供大量公共就业机会,从而缓解城市贫困(Keyserling, 1967)。

由于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各国采取的具体对策差异很大。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强调以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提高就业率和解决失业问题。此外,欧盟曾采取社会行动为特地区、行业、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以补偿因产业结构转化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美国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以来,从未采取过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主动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90年代一些左翼学者曾提出“工作共享”(Worksharing)的概念,即减少工人平均工作时间,以保证工人的就业率。但大部分的美国学者认为,工资不是个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并且,一定时期内,工作共享必然带来工资水平的降低,只有将“工作共享制”与税收、政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相结合,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引发的贫困问题(Gans, 1996)。

对于发展中国家,以高速增长,保证国民充分就业,仍然是减少贫困的基本战略。例如一些亚洲国家采取劳动密集型加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既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防止了因盲目引进高技术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二)、社会福利政策

Esping Anderson 在著作 *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 (1990) 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福利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家庭与志愿机构的援助,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家庭纽带与社会志愿团体在社会福利中发挥很大作用,政府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和私有化的就业方式。在英美等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个人贫困被视为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竞争的结果,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水平较低,往往家庭和市场机制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时,社会福利项目才给予直接帮助。而瑞典等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国家,则采取完全的“福利主义”模式,政府直接提供多样的福利保障形式,避免社会成员因各种原因陷入贫困(见图 1-6)。

然而欧洲国家多年的“高福利”政策,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并造成低收入者对福利的依赖性(Welfare Dependency)。7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纷纷改革其福利制度,提出一些创新的社会福利项目。欧洲学者提出了“契约参与式”(Contractual Involvement)的福利计划,即参与者在享受福利待遇的同时,必须履行该计划所规定的责任义务(Donzelot, 1991)。

5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福利概念也发生飞跃。社会福利的对象由“单纯的被动的接受服务的人”(Client-recipient),转变为“积极地去利用社会服务的市民”(Citizen-recipient)。美国许多州设置了工作福利制(Workfare)计划,试图要求人们在领取福利的时候参加培训或教育计划,以促进他们经济上的独立。1988年通过的《家庭援助法案》设立了一项重要条款,即开创“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Job Opportunities and Basic Skills, JOBS)的计划,目的在于为穷人提供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以增加穷人就业机会,结束贫穷的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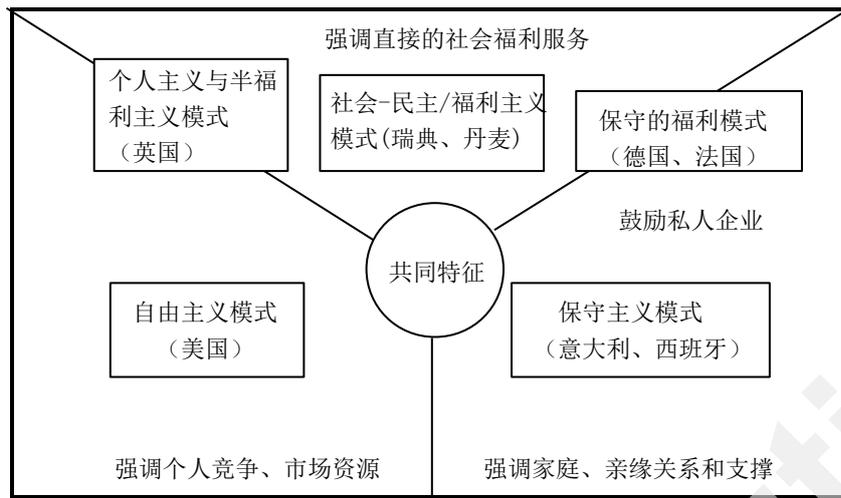


图 1-6 西方国家的福利模式 (Anderson, 1996)

1.2 国内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

1.2.1 城市贫困阶层的特征与界定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普遍关注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伴随着城市中富裕阶层的出现，另一个城市贫困阶层也在悄然形成。学术界关于城市贫困阶层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但从“城镇贫困人口”、“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等各种相关概念，我们可以了解我国城市贫困阶层的主要特征。

有学者提出城镇贫困人口主要由这样几类家庭构成：（1）无依、无靠、无收入来源的社会救济与优抚对象；（2）停产半停产或严重亏损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困难职工家庭；（3）部分离退休人员家庭；（4）部分无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家庭；（5）有病或残疾人的家庭。城市贫困者的共同特征是入不敷出，收入低到仅能维持或难以维持基本需求，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极为脆弱等等（唐忠新，1998）。樊平认为，低收入群体是具有劳动能力、但在投资与就业竞争中居于劣势、只能获取较低报酬的社会成员。而贫困群体不仅包括一部分低收入者，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无业和失业社会成员，他们的生活状况往往难以维持生存和体面的社会尊严（李培林等，1995）。另有学者从社会脆弱性的角度，定义了当前社会贫困阶层，认为“凡是具有贫困性的社会群体都是社会弱者”，“各贫困群体不仅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客观状态上具有贫困性和低层次性，而且在主观状态上也具有脆弱性。”（陈成文，2000）

在对城市贫困阶层的具体研究中，社会学者通常采取绝对与相对的两标准。

（一）、绝对的标准

1、社会救助的标准

传统的城市社会救济对象是陷入生存困境，最为迫切地需要外界援助的城市居民。接受城市社会救济的成员主要有（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2）部分失业且家庭人均收入很低的居民；（3）部分家庭人均收入很低的在职、下岗和退

休人员。一些早年的退休人员每月仅 300 多元退休金，若用来维持家庭全部开支，生活必然十分拮据。

2、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

为完善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国务院于 1999 年 9 月颁发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当前城市救助制度可以理解为：国家实行的，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向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公民，提供满足最低生活权利的一项制度，又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实际代表了各政府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据此，汪雁等采取以下界定标准（2000），认为城市贫困人口是指根据该条例，县政府所在地建制镇以上各级城市中，收入在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的非农业人口。

3、恩格尔系数的标准

李培林等认为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会造成以收入和职业地位为标准的分层指标失真。他采用衡量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将中国城市家庭分为七个消费阶层，以恩格尔系数 0.7-0.79 为贫困阶层，0.80 以上为最贫困阶层，前者占家庭总数的 12.9%，后者占总数的 9.9%，总共比重达 22.8%。（李培林，张翼，2000）

（二）、相对的标准

根据有关学者统计，若将家庭人均收入相当或低于城镇人均收入 1/2 左右的城镇人口视为城镇贫困人口，我国的城镇贫困人口大约 3500 万人，约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 10%（唐忠新，1998）。

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城镇住户调查的结果，其中将收入最低的 10% 定义为“困难户”，将收入最低的 5% 看成是“贫困户”。1995 年“贫困户”人均生活费收入为 1723.24 元，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为 2060.96 元。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认同“5% 低收入组等于贫困者”的概念（李培林等，1997；关信平，1999）。

1.2.2 城市贫富分异的差距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贫富差距有所拉大。1994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中，最富有的 1/5 家庭（即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占全部收入的 44.46%，而最贫穷的 1/5 家庭（即收入最低的 20% 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 6.04%²。城镇居民在财富占有方面的差距也相当突出，以城镇居民在金融资产方面的差距为例³，贫困型家庭户均金融资产仅相当于平均水平的 11.3%。最近，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分析，“九五”期间，我国收入差异表现为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以 3.10% 的增长速度扩大，财富正以 1.83%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对于目前贫富分化的程度，存在不同的看法，李强认为，我国的贫富分化程度高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小，而低收入阶层规模庞大（见表 1-3）。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贫富分化正在改变一些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原先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身份群体，逐渐分化或解体，以贫富差异为主要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正在形成。

² 见李培林主编，《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报告》，第 337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³ 见唐忠新，《贫富分化的社会学研究》，第 37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表 1-3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各层占有收入的比例 1994 年和 1996 年

按家庭年收入从低到高分五组	各组占有全部收入的比例 (%)	
	1994 年	1996 年
最低的 20%	6.04	5.78
次低的 20%	11.16	10.71
中间的 20%	15.77	15.07
次高的 20%	22.57	20.81
最高的 20%	44.46	47.62

资料来源：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 年。

1.2.3 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阶层

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由下岗、失业人员构成的贫困群体日益受到关注，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据肖文涛研究（1997），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来源较广，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包括：（1）原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企业陷入困境而失业或下岗的人员；（2）因个人素质低而无法找到工作的待业者；（3）难以承受物价持续上涨的低收入者；（4）商海竞争中的失败者，天灾人祸造成的贫困者，单亲家庭中的成员，从事不法行为乃至判刑的人员及家属，以及无稳定工作的进城农民工等等。其中，部分“双停”企业职工由于多年停发、减发工资，基本生活来源面临断绝的危险，成为城市贫困阶层的主体。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型，诱发贫困的因素增多。董淑芬（2000）认为当前我国城市贫困阶层呈现新的社会特征。主要表现为（1）贫困人口规模增加，贫困程度加深，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企业职工成为贫困阶层的主体；（3）城市贫困人口的地区、行业、所有制差异不断扩大；（4）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意识显露，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严重。

目前，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引起国内社会学者的关注。随城市社会的变迁，“不同阶层的人口，开始有规律地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位，其中包括，城市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产生了新的“城市贫民区”（陈涌，2000；李强，2000）。国内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较早就注意到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现象，其中对于北京等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聚落分布，以及社会空间极化的机制研究已经相当成熟（顾朝林，1997）。

1.2.4 关于现阶段我国是否存在底层群体

李强（2000）等认为，改革以来利益结构的调整，使得部分群体获得利益，也造成另一部分利益受损。他采用经济的标准，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包括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底层群体。其中的底层群体类似于英文 Underclass 一词，从经济分层标准看，“底层群体”属于绝对的利益受损者，包括所有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群体，从构成来看，城市中的“底层群体”主要包括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贫困农民和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他们缺乏经济上的来源和保障，也不一定能够享受社会保障或社会救济，尤其是流入城市的民工，并不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列，因此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城市贫困阶层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是基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社会空间分异的理论，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理论等认识基础上，而对城市贫困阶层的具体空间分析，需要引入一般的社会空间统计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

2.1 社会分层的理论

2.1.1 关于社会分层的解释

所谓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⁴。针对社会分层的原因、功能和状况，西方社会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分层理论。

1、功能主义的解释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摩尔（K. Davis & W. Moore, 1945）的研究最能够充分表达功能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现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是必要的。社会分层具有各种积极的功能，它能够通过各种社会报酬（如财富、权力和名望等）激励社会成员努力工作，并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戴维斯-摩尔分层理论的基本要点可概括为⁵：（1）人们的基本社会需求是生存，而生存需求的满足是通过履行各种职业角色来实现。

（2）由于各种职业对于社会的功能作用不同，社会提供各种报酬形式，刺激人们接受某些重要的职业，以及该职业所需的长期培训。（3）各社会职业对于社会价值的不同，社会对它们的报酬也不等，正是报酬与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分层。（4）社会分层保证了社会处于最佳功能运行状态，是社会进化的有效途径。

2、冲突主义的解释

对于冲突理论家，社会分层并不是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而是强大群体对弱小群体剥削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图明（M. M. Tumin）认为，社会分层是权利群体的价值体现，必将阻碍社会与个人的充分发展。他指出社会分层的功能弊端在于⁶：（1）社会分层使上层社会的人们有发挥才能的机会，而大多数社会下层的人们没有同等机会，严重限制了社会智力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2）社会分层往往具有维持社会现状的功能，即社会特权阶层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规范的形式使社会不平等现象合理化。（3）社会分层可能触发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对立与不满情绪，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或根本性变革。

大多数冲突理论都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之上，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特点。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 Dahrendorf）以权力为区分阶级的标准，将社会阶级划分为掌权阶级和服从阶级，前者在维护权力结构的过程中获利，而后者只有在推翻这种权力结构时才能

⁴ 见[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239页，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⁵ 见奚从清等主编，社会学原理，第186-187页，1994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⁶ 见奚从清等主编，社会学原理，第187页，1994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获得利益。

2.1.2 关于社会分层的标准

1、韦伯的分层标准

最早的社会分层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在西方社会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在 1922 年的《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即在经济领域存在着阶级（Class），在社会领域存在着身份地位（Status）或声望差别，在政治领域存在着政治派别。该社会分层体系包括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多个分层标准。其中，经济标准指收入与财富的多少；社会标准即社会地位，是对个人荣誉、声望的评价；所谓政治标准也就是权力，指个人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

韦伯的理论为西方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明确的分层标准。美国社会学家沃纳（Lloyd Warner, 1949）在此基础上，按财富、声望和权力等标准，将美国社会分为六个社会阶层。该方法也称“韦伯—沃纳分层法”，已成为西方社会一种较固定的分层模式。另有学者采取单个标准进行社会分层，例如根据收入或财富的差异，对职业声望的排序等，来确定社会分层结构。

2、马克思的分层标准

马克思在阶级划分的同时，也进行了社会阶层的分析。他认为阶级与阶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领会他对阶级的定义，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劳动组织、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领取社会财富多少的不同，决定了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的地位差别。同时马克思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被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在每个阶级内部又存在着各种独特的等第。

3、毛泽东的分层标准

毛泽东在 1926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中，根据政治、经济的双重标准，描述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体系，包括（1）地主阶级、买办阶级，（2）中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3）小资产阶级，（4）半无产阶级，（5）无产阶级，（6）游民无产者。新中国成立后，该标准被继续沿用来划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2.2 社会空间分异与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2.2.1 城市生态结构理论

美国社会生态学派运用人类生态学的生物比拟法则，研究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过程。伯吉斯认为，低阶层家庭向高阶层居住区的不断“侵入”（Invasion），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各层带取得优势地位，逐步形成同心圆状地域结构。霍伊特认为，对外交通干道和高收入阶层提供的财富是城市空间延伸的基础，居住区通过“过滤”（Filtering）演替，形成扇型

结构模式。

50年代开始的社会区分析发现,集同心圆、扇型和多核心为一体的模式更具有普遍性。北美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呈同心圆状分布,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居住呈扇型分布,而少数民族倾向于集中在城市某个特定区域,三者叠加而成城市社会空间的复合结构。然而“伯吉斯-霍伊特”模式并不完全适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出现“反向同心圆”(Anti-Zonal)的模式,低收入阶层大多居住在城市外围。

戴维斯(W. Davies)认为历史上,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往往取决于家庭、社会地位、民族和移民状况等四个主要因素,当前西方社会日趋复杂,造成社会空间分异的因素更多,新移民,职业分化,社会福利的依赖人群,和社会底层阶级的产生,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形成,使得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趋于“零碎化”。

2.2.2 新古典经济学与区位论

由于60-70年代的社会区分析,仅以居住为影响因子加以分析,忽视了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区位差异,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一些学者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空间变量,探讨在理想竞争状态下的区位均衡,解释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

美国城市经济学家阿朗索等(W. Alonso, 1964)从土地价值角度研究了城市地域空间的分化。随市中心向外距离的增加,区位地租逐渐降低,用于交换、生产和居住这三种功能的土地价值随距离的变化率是不同的。

另有学者提出了居住空间分异的模式(‘Trade-off’ Models),该理论假设城市所有经济活动均以CBD为中心,每个家庭至少拥有一位劳动者,资本具足够的流动性,使各家庭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空间的需求。依照该模式,距市中心的距离越远,区位成本(通勤费用)越高,而住宅成本(地租等)越低,人们根据“收益-费用”曲线与各自的经济承受力,选择最佳居住区位(见图2-1)。低收入家庭由于对居住空间的收入需求弹性很低,只能选择临近市中心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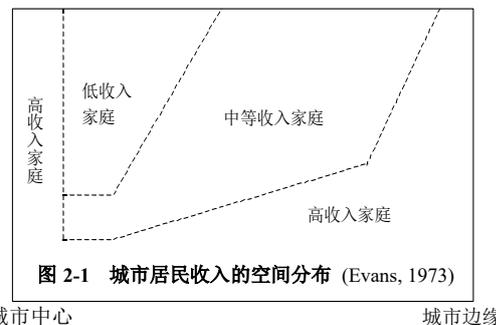


图 2-1 城市居民收入的空间分布 (Evans, 1973)

城市中心 城市边缘

2.2.3 马尔克斯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后福特经济转变下,城市呈现新的空间特征,表现在居住空间(Residential City)与经济空间(Economic City)两方面。从居住特征看,城市空间逐渐分化出高级居住区(Luxury Housing Spots),士绅化街区(Gentrified City),郊区(Suburban City),廉租区(Tenement City),被遗弃的街区(Abandoned City)。城市居住的分异现象,与城市经济结构的分化是并行的。为适应不同的经济功能要求,城市的空间也分化为不同的经济活动空间,即决策管理区、高级服务区、生产区、非技术性和非正规行业区、其它地区。

马尔克斯(Peter Marcuse, 1996)认为目前欧美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并非不同阶层生活方式与物质需求的简单反映,城市的经济空间结构也不是单纯效率分配的结果,总体看来,城

市的空间结构不仅客观上反映，而且无形中强化了既有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与多元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作用关系（见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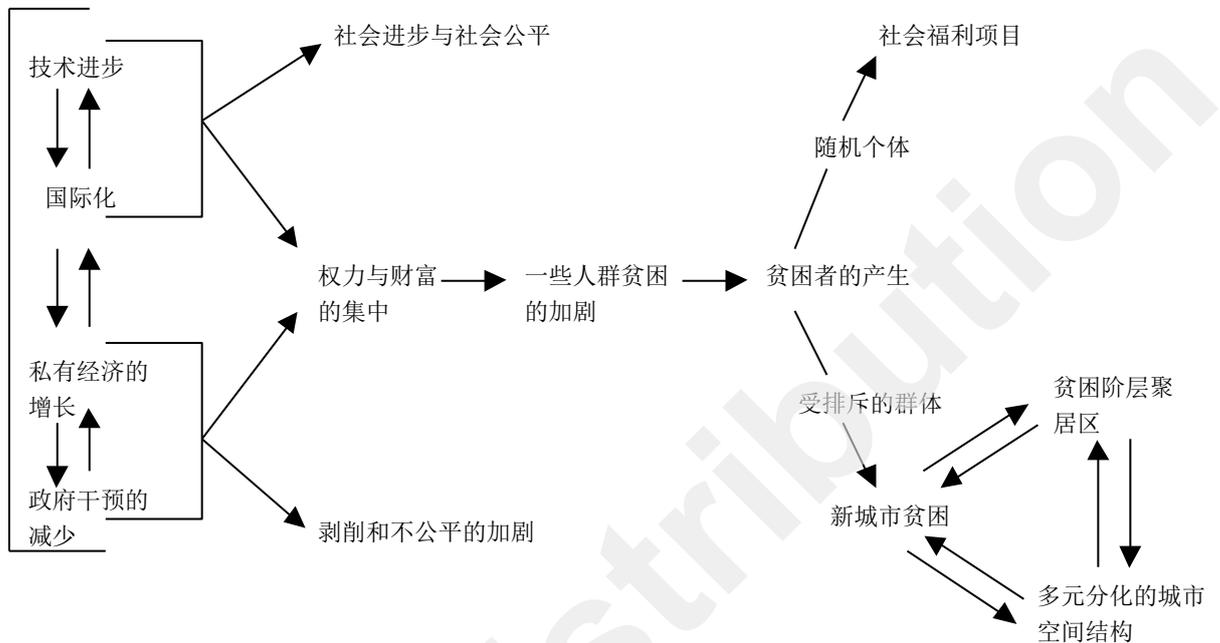


图 2-2 城市贫困阶层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Marcus, 1996)

2.3 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理论

六、七十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深，不少国家都面对劳工运动、学生运动等政治冲击，人们不再满足社会不平等是自然发展的解释。针对城市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西方城市理论界的社会福利学派、马克思学派和韦伯学派，分别对传统的城市结构理论提出了挑战。

2.3.1 社会福利学派

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效率一样，是经济运行的目标之一。由于市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政府应通过收入转移或再分配，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地理学家戴维·史密斯 (David Smith) 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福利的地域研究方法，试解决资源分配中，“谁、在何处、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的问题。他在社会区分析所采用的人口与住房指标外，率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指标，开展了对人们生活质量的空間分析。

福利学派仅仅建立了衡量社会公平，及其空间差异的标准，它没有提出具体的资源分配模式，也没有对分配的不公正做出解释。但其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对欧美等国的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及生活质量的研究均有重要影响。

2.3.2 马克思主义学派

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社会冲突是城市研究的重点,将城市的不公平归咎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哈维(David Harvey)认为,现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城市的交通体系、工业区划、公共设施和住宅的分布,会阻碍社会再分配的目标实现,使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更加严重。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作为规划与决策制定者,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例如,城市现有的用地结构,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多重效应。当经济增长时,人们对于区位较好的土地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地价增长的速率远高于工资的增长,这部分土地所有者的资产价值将不断扩大,使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在空间上进一步极化。

2.3.3 韦伯学派——城市管理学说

韦伯学派也很关注城市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社会冲突与权力分布等问题,但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派将资源的不公平完全归结为社会结构,相比之下,它更强调社会结构内个人的理性行为。借用了韦伯的理论,帕尔(R. E. Pahl)提出了城市管理学说。他在研究中发现,城市空间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居于高尚住宅区的中上层人士享有较好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得到的社区资源远比居于贫民窟的低下层市民为多。这样使社会不平等或贫富悬殊问题进一步恶化。

帕尔认为,城市资源的分配并非完全取决于市场,部分资源是通过政府的科层体系去分配的。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有很多城市管理者(Urban Manager),例如房屋事务管理者,城市设计师,建筑师,地产商,社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这些管理者对城市资源有一定控制权力,并有自我的价值取向与目标,他们会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强化或减弱现存的社会不平等。

2.4 社会空间统计分析的方法

2.4.1 社会空间统计分析的方法

1、社会区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与因子生态学(Factorial Ecology)方法

Shevky, Bell 和 Williams 提出的社会区分析,是利用城市人口分区调查资料,考察各区居民社会阶层(Social Rank)或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城市化或家庭地位(Family Status)、和社会隔离(Segregation)或种族地位(Ethnic Status)的差异,并用一系列指标对各社会区分类,建立社会空间结构模式。具体的方法包括:(1)严格的普查区意义上的社会区分析,以 Shevky-Bell 的七个指标为基础,通过二维分类方法建立社会空间结构。(2)严格定义指标的因子分析,用多元因子分析方法解决。(3)因子生态学方法,运用了更多范围的社会经济、人口和住房指标,包含三个以上的变量维,有时包括迁移状态。

因子生态学的实质是采用因子分析模型来分析 n 个基本空间单元的 p 个社会经济、人口和住房等变量,将其组成一个 (n, p) 矩阵,转换为 r 维 ($r < p$) 的矩阵 (n, r) ,通过消去线性相关的冗余信息,使这 r 个因子包含了原始数据的所有统计信息。

2、社会福利函数(Social-Welfare Function)

因子生态学分析的方法，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影响要素，例如环境质量、医疗设施、商业中心等公共设施的可达性等。社会福利函数的方法，在选取社会指标体系时，包含了以上因素，除社会、经济、人口等，还考虑到影响外部经济的要素。

2.4.2 贫困阶层的社会空间分析

在社会学研究中，通常采用（1）居民的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指标，或（2）接受社会福利的贫困者等统计资料，利用均值、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峰值、偏离度等统计量，描绘贫困阶层的空间特征及分布类型。

此外，在社会地理学研究中，有两种与城市贫困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

（1）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综合衡量方法

生活质量的研究为研究城市社会空间差异，提供了数量分析的可能性。关于生活质量的指标建立，有不同的方法。史密斯（D. Smith, 1973）选取了以下指标：（1）社会福利依赖性，（2）空气污染程度，（3）娱乐设施水平，（3）吸毒案例，（4）家庭稳定程度，（5）地方的参政意识。通过对各个统计区域内的指标值标准化，进行加权综合，得出各社区的生活质量分异。

诺克斯（P. L. Knox, etc, 1978）在研究中选取了 11 类共 50 个变量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变量反映了生活水平的各个方面，包括健康状况、住房水平、就业机会、教育程度、个人信誉、收入与消费水准、娱乐、社会与政治参与、生活适宜程度、环境质量、和社会稳定等。

（2）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的评价方法

社会剥夺程度是对贫困的一种相对性的理解，可以反映贫困者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空间分布。对社会剥夺程度的空间分析，一般采取多指标的综合评分法。例如在各统计单元内，选取住房适宜度、居住面积、空置住房、子女数、低收入者、失业人员、残疾人、重病患者、单亲家庭、家庭人口数等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或主成份分析，计算各单元的综合得分，划分其社会剥夺的等级。

2.5 社会调查的方法

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对于城市贫困阶层的调查，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1、调查对象的选择

确定调查对象的方法有两大类，一种是全面调查，即对调查对象总体的所有单位进行调查，另一种是非全面调查，是对对象的部分单位进行调查，包括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

典型调查是在对调查对象总体有所了解的基础上，选择少量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并以此大体估计总体情况的方法。调查单位的代表性，取决于调查者对总体内部的差异性的了解。

2、调查资料的搜集

(1) 问卷法

问卷法是运用统一的问答资料向被调查者了解情况的方法。针对社会阶层的调查,问卷法可以反映某个阶层的一般趋势与状况,也可以对不同阶层的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问卷法的主要特点是可以运用标准化工具,进行定量分析。

(2) 访谈法

访谈法是调查者直接向被调查者口头提问,当场记录答案的一种方法。访谈是一种互动的形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针对不同对象,和具体的情境进行深入的了解。

三、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调查

为了研究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笔者曾于 2001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走访了南京市民政局、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并在同学协助下，对城市贫困阶层的典型居住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

3.1 城市贫困阶层的规模调查

国内对于城市贫困阶层的实际测量，主要采取贫困线的确定方法，综合考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住房状况。在本次调查之前，并没有有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的规模、贫困程度及其分布，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次调查参照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贫困阶层的界定标准，结合了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每年在各城市中进行“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对南京市贫困阶层的规模做初步估测与分析。

根据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资料，2000 年南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约为 1.8 万，占全市非农人口比例的 0.57%。据有关部门估计，这部分人口仅仅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与实际生活水平相对贫困的人口相比，仅占其 5-10% 左右。由此推算，南京的城市贫困层约占城镇总人口的 5%-10%。

3.2 城市贫困阶层的典型调查

3.2.1 调查地点

接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代表了城市生活中最为窘迫、无助的一部分人群，他们在空间的主要分布地区，大多是贫困阶层较为集中的地带。

根据南京市接受社会保障人员的分布差异⁷，从鼓楼、玄武、白下、秦淮、建邺和下关等六城区范围内，按适当比例选择了 11 个典型社区，对社区内的贫困家庭进行调查。具体包括：（1）建邺区的安品街--评事街，问卷 10 份；（2）玄武区的梅园--梅园、汉府街，问卷 10 份；锁金村--锁金六村，问卷 7 份；（3）秦淮区的中华门--西街、下码头，问卷 14 份；钓鱼台--荷花塘、高岗里，问卷 8 份；（4）下关区的中山桥--宝善街、南通路，问卷 22 份；建宁路--五所村，问卷 7 份（见图 3-1）。

3.2.2 调查方法

在对各社区的调查中，采用类似“滚雪球”⁸的调查方法，访问 78 户家庭，共 230 人。

⁷ 详见本文第四章：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社会空间分析。

⁸ “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是一种非概率抽样技术，常用于定性的实地调查中。在无法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或难以找到对象总体的成员时，可以先搜集少数群体的资料，再根据他们的建议，找到其他的成员。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对无家可归者、流动劳工、移民的样本调查。

调查后经筛选，得到有效问卷共 78 份，有效率为 100%。

问卷具体分三个部分，一是对家庭成员基本状况的调查，二是对家庭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调查，三是针对贫困阶层的具体问题，如是否失业、下岗或退休、无业人员，是否领取社会保障等。

此外，为了解问卷以外的更多有关情况，对部分被调查的贫困家庭，调查地点所在的社委会和居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居民，进行了深入的无结构式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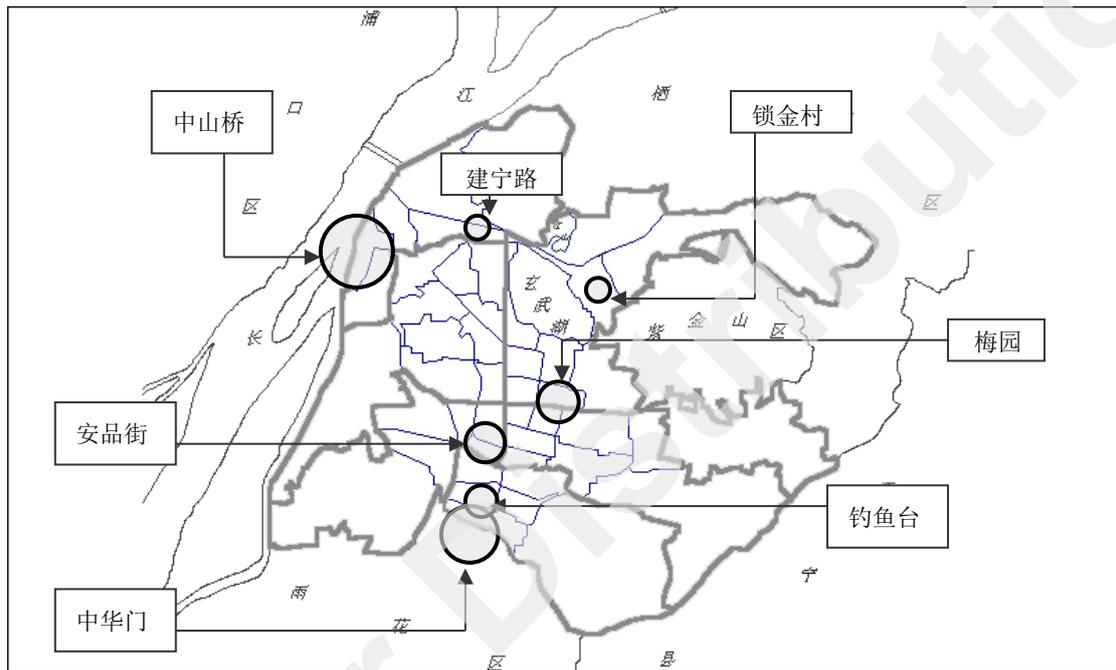


图 3-1 南京市贫困阶层调查地点示意图

四、南京市贫困阶层的社会空间分析

4.1 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

根据目前对南京市贫困阶层的唯一统计数据，即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统计资料，可以基本判断城市贫困阶层在6个城区，47个街道基本统计单元内的主要分布特征。

4.1.1 从各城区来看，在城南与城西的秦淮区与建邺区，以及城北的大厂区，接受社会保障的人口比例最高，城中的玄武区与城东的白下区比例适中，鼓楼区的比例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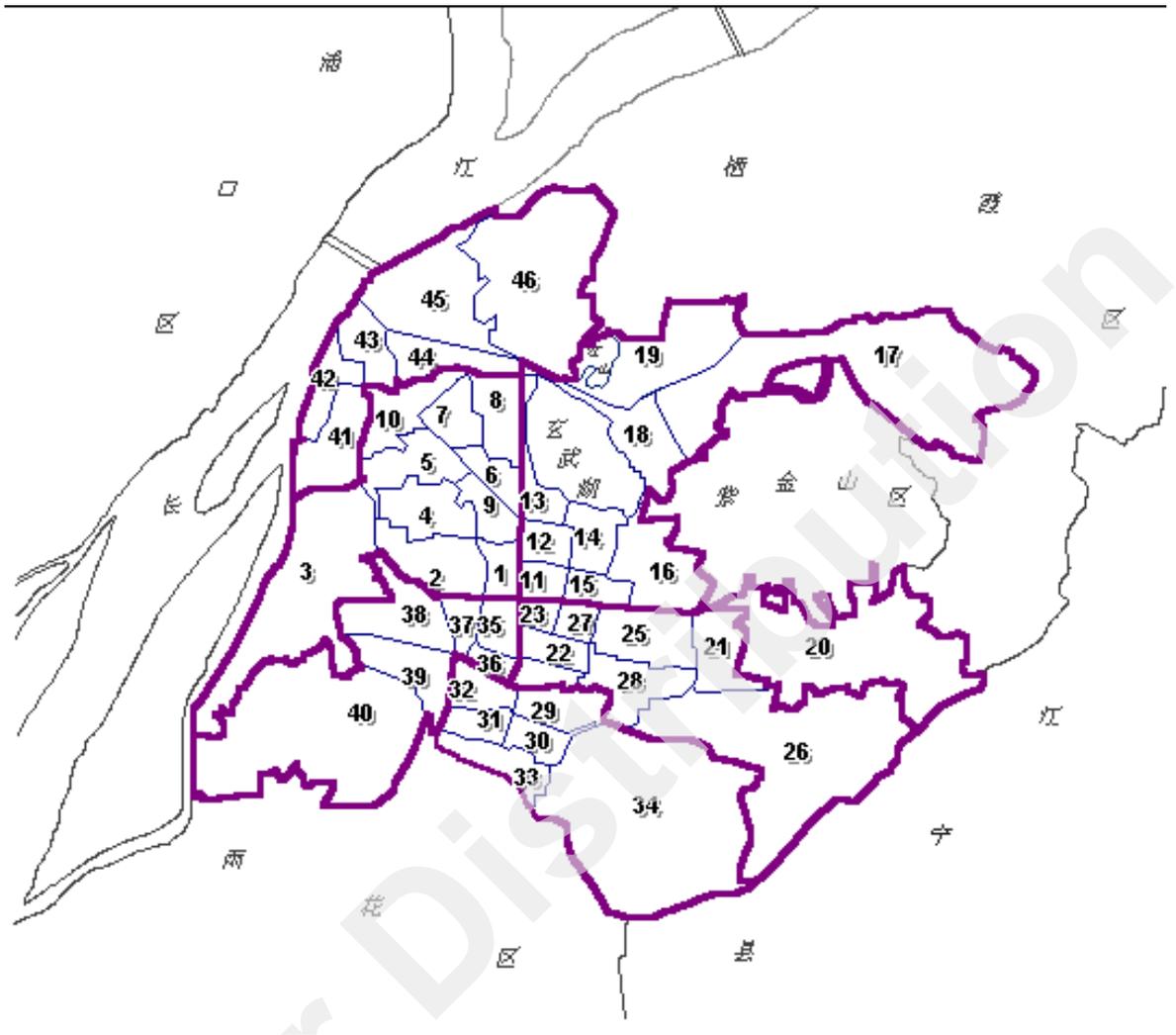
表 4-1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分区差异

城区名称	社会保障户数 (户)	占总户数的比例 (%)	社会保障人数 (人)	占城市人口比例 (%)
玄武区	624	5.07	1231	3.18
白下区	669	6.40	1327	4.27
秦淮区	708	8.01	1397	6.24
建邺区	671	7.56	1335	5.69
鼓楼区	652	4.43	1346	2.60
下关区	709	7.31	1407	5.09

4.1.2 具体从各个街道的比例来看，城市贫困阶层的分布在各区内还存在显著差异。根据47个街道的统计数值 P ，计算得出均值 p 与偏差 σ ，在此基础上，将这些街道划分为五类，分别是 I 类，低于均值即 $P < p - \sigma$ ；II 类，略低于均值， $P \in (p - \sigma, p)$ ；III 类，略高于均值， $P \in (p, p + \sigma)$ ；IV 类，较高， $P \in (p + \sigma, p + 2\sigma)$ ；V 类，很高， $P > p + 2\sigma$ 。由表可见，贫困人口比例相对较高的街道包括，玄武区的梅园、红山，建邺区的安品街，秦淮区的中华门，下关区的中山桥。（见图 4-1、图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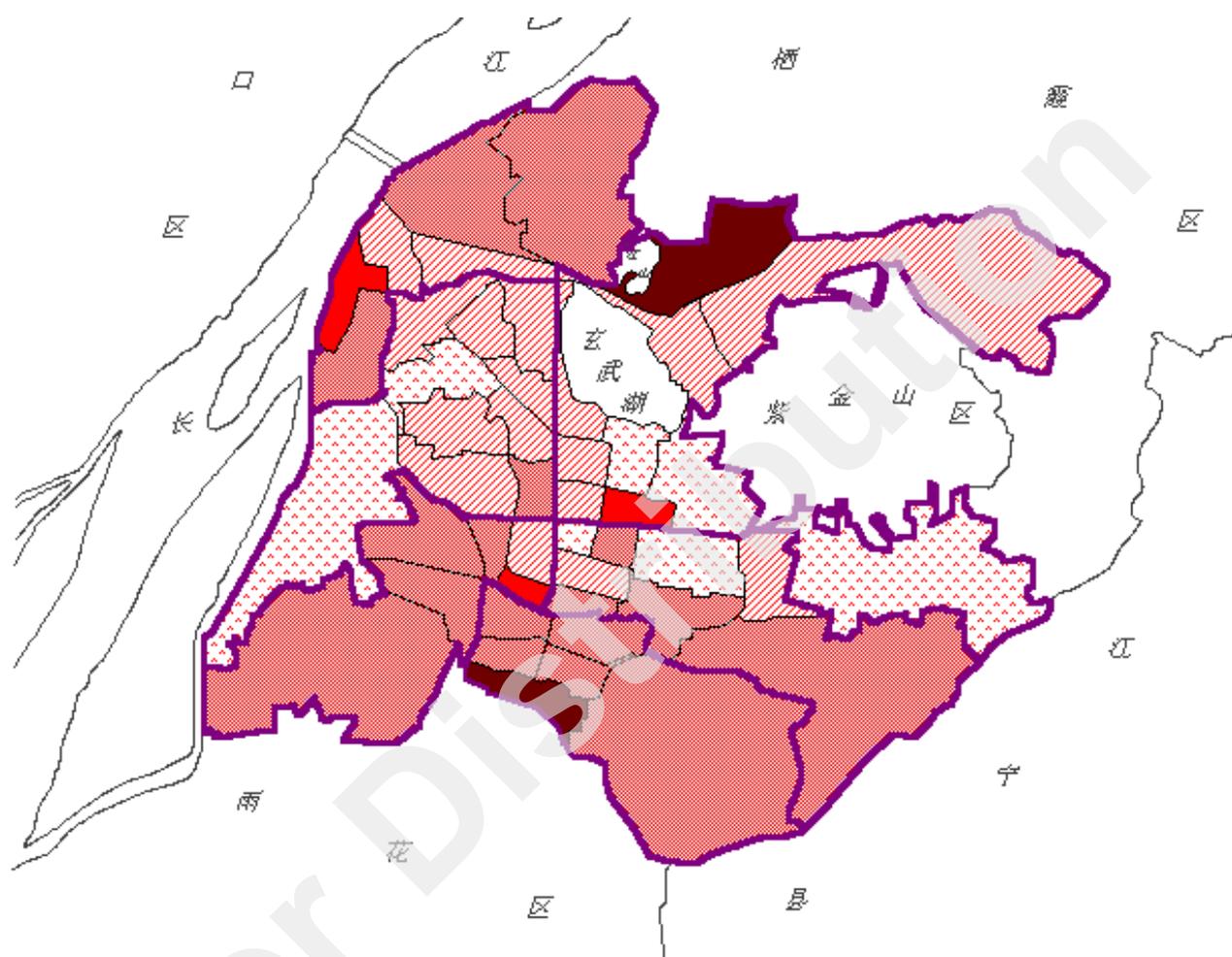
表 4-2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

类别	街道名称
I 类	江东、水佐岗、兰园、后宰门、孝陵卫、淮海路、瑞金路
II 类	五台山、宁海路、湖南路、三牌楼、中央门、鼓楼、挹江门、新街口、丹凤、玄武门、玄武湖、锁金村、苜蓿园、洪武路、朝天宫、车站、建宁路
III 类	华侨路、健康路、石门坎、五老村、大光路、夫子庙、钓鱼台、双塘、秦虹、红花镇、饮虹园、止马营、莫愁湖、南湖、兴隆、热河南路、宝塔桥、小市
IV 类	梅园、安品街、中山桥
V 类	红山、中华门



- | | | | | | |
|-------|--------|--------|--------|--------|---------|
| 1 华侨路 | 9 鼓楼 | 17 玄武湖 | 25 瑞金路 | 32 双塘 | 39 南湖 |
| 2 五台山 | 10 挹江门 | 18 锁金村 | 26 大光路 | 33 中华门 | 40 兴隆 |
| 3 江东 | 11 新街口 | 19 红山 | 石门坎镇 | 34 秦虹 | 41 热河南路 |
| 4 宁海路 | 12 丹凤 | 20 孝陵卫 | 27 五老村 | 红花镇 | 42 中山桥 |
| 5 水佐岗 | 13 玄武门 | 21 苜蓿园 | 28 大光路 | 35 朝天宫 | 43 车站 |
| 6 湖南路 | 14 兰园 | 22 洪武路 | 29 夫子庙 | 36 安品街 | 44 建宁路 |
| 7 三牌楼 | 15 梅园 | 23 淮海路 | 30 饮虹园 | 37 止马营 | 45 宝塔桥 |
| 8 中央门 | 16 后宰门 | 24 建康路 | 31 钓鱼台 | 38 莫愁湖 | 46 小市 |

图 4-1 南京城区街道辖区示意图



(Note some figure legend cannot be recovered)

图 4-2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分布示意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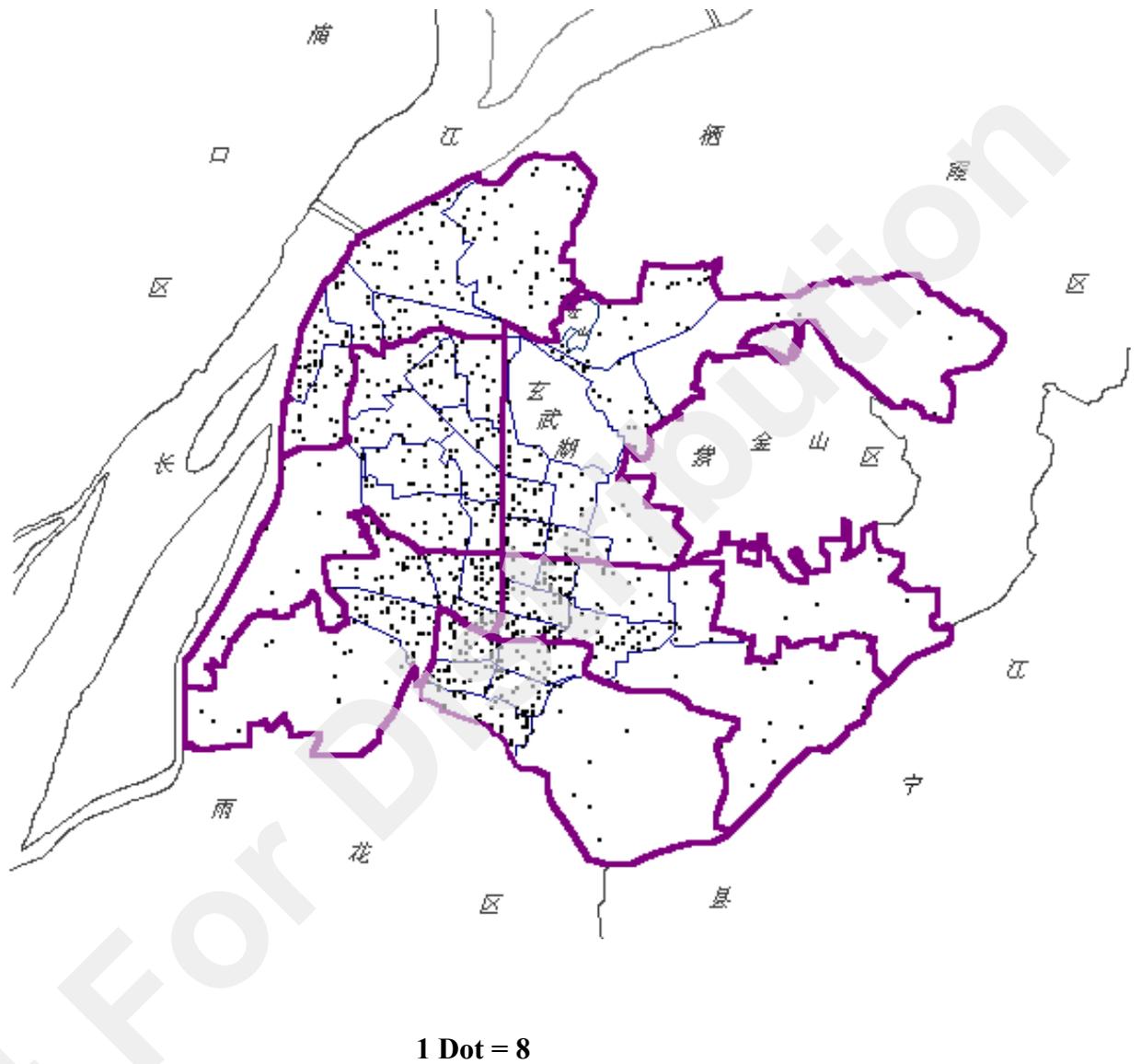


图 4-3 南京市贫困阶层分布示意图 (b)

4.1.3 从空间分布密度来看,城市贫困阶层的居住,集中在城南和城中地区,和城西的下关区。(见图 4-3)

这一分布状况,与南京城市的历史发展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城南地区---- 早在明代,城南就是贫民住宅区,其时城南为手工业区,范围东起大中桥,西至三山门(今水西门),南达聚宝门(今中华门),北抵北门桥(今珠江路北)。不仅有织锦坊、弓匠坊、铁管坊等各式作坊 18 个,而且居住着 10 余万手工业者。解放前,这一地带既有最繁华的商业街——三山街,也有居住条件最差的地区,据统计当时棚户区 309 处,位于城南的就有近 6000 户。

城中地区--- 城中的白下区也是南京历史上的老城区之一,自唐代就是交通发达、商业繁荣之地。解放前,内秦淮河以东,为飞机场和大片菜地,内秦淮河以西,除新街口、太平路较为繁华,大多地区房屋破旧,区内有中山南路、五老村、公园路等 17 片棚户区,铁路沿线与秦淮河两岸,也零散聚居着不少人力车、搬运、铁路工人和流入城市的农民。80 年代,先后建立了瑞金新村、蓝旗街、标营等多片居住小区。

城西地区--- 历史上,建邺与下关区均为棚户集中的地区。建邺为东吴都城旧址所在,解放前,仅 6.9 平方公里内分布着宫后山、石城村等 13 个棚户区。80 年代以来,兴建了南湖新村、莫愁新寓等居住区,吸纳了大量由农村返城的下放人员及其家庭。下关是历史上的商埠区,曾有相当的店铺市街,解放前大多衰败不堪。旧时的下关,也是船民、搬运工和逃荒而来的难民集中地,他们常年居住在芦席、泥土围起来的“滚地龙”中。1949 年该区内有七八千个“滚地龙”,现金陵新村、五所村、姜家园、热河南路等以往贫民居住地区,已建成多片居住小区。

4.2 城市贫困阶层的基本特征

城市贫困阶层究竟是由那些人构成,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可以对当前南京市贫困阶层作如下描述。为了便于分析,将本次调查家庭按收入、居住状况分为以下三类,进行比较分析。

表 4-3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研究分类

	A 组 (收入贫困者)	B 组 (住房困难者)	C 组 (收入贫困且住房困难者)
	家庭人均月收入 <343 元 ⁹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10m ²	家庭人均月收入 <343 元, 人均住房面积 <10m ²
调查户数 (户)	53	37	30
人数 (人)	167	131	109
人均收入 (元)	203.81	239.74	190.42
人均居住面积 (m ²)	10.19	6.79	6.86

9 根据南京市 2000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8233 元,相当于月均 686 元,取 1/2 为 343 元。

4.2.1 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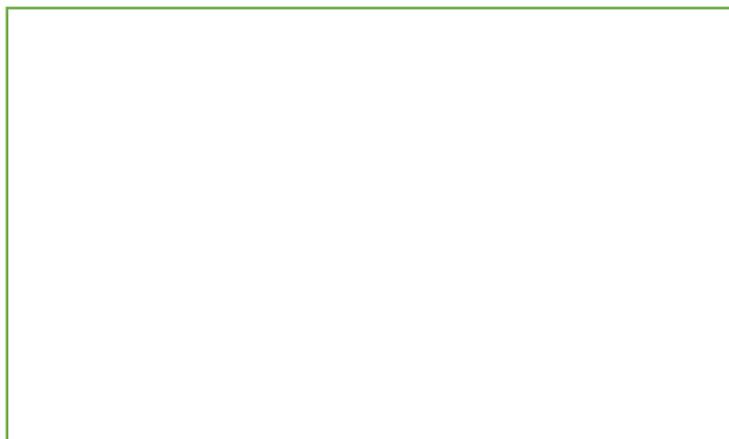
在年龄方面，贫困阶层中，36-45 岁的中年人和 46-60 岁的中老年人比例最高。在收入贫困层中，高龄老人（71 岁及以上）和没有经济来源的未成年人（15 岁以下）比重明显偏高，而 26-35 岁的中青年人和 61-70 岁的老年人，突出表现为住房困难。在收入贫困而且居住面积狭小的“双重贫困者”中，15-25 岁的青年和 36-60 岁的中年和老年人比例偏高。

从性别构成来看，B 组、C 组中女性比例明显低于男性，然而 A 组中，即收入贫困组中，女性比例相对其它两组略高一些，几乎与男性比例持平。



图 4-4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年龄结构

	女性	男性
A 组	49.1%	50.9%
B 组	46.6%	53.4%
C 组	47.7%	52.3%



4.2.2 受教育程度

贫困阶层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从调查中了解到，A 组收入贫困者中有 15% 是文盲，约 4/5 左右的人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只有 1/5 的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在 C 组收入住房双重贫困者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比例更高，达 83% 以上。

表 4-4 城市贫困阶层的文化程度 (%)

	未受过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技校/职高	大专	大学本科	研究生
A 组	15.2	28.5	35.8	12.0	6.1	1.8	0.6	0
B 组	13.4	30.7	33.9	9.4	9.4	2.4	0.8	0
C 组	15.0	30.8	37.4	8.4	5.6	1.9	0.9	0

4.2.3 职业构成

从职业分布来看,工人是收入贫困的最大群体,其次是无正式职业的人员,共占 90%以上。B 组住房困难户的职业分布面较广,除“教师/科研人员”与“商业工作者”,其它各类职业都有代表。在 C 组双重贫困阶层中,职业的分化更为明显,可以说,工人与无业人员是当前城市贫困阶层的主要构成。但是这些工人仅有少部分和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

表 4-5 城市贫困阶层的职业分布 (%)

	工人	领导干部	教师/科研人员	企业技术人员	企业管理人员	商业工作者	服务业工作者	无正式职业
A 组	52.8	0.8	0.0	0.0	0.0	1.6	3.3	41.5
B 组	54.0	2.0	0.0	2.0	2.0	0.0	2.0	38.0
C 组	51.9	1.2	0.0	0.0	0.0	0.0	1.2	45.7

4.2.4 个人与家庭的致贫原因

导致个人与家庭陷入贫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在调查中发现,家庭人口较多、而就业人口较少,家庭中有非农业、或“农转非”的户口类型,和一些身患重病或残疾,而又缺少固定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家庭,占城市贫困层的比例最高。由此我们首先选取了家庭人口与家庭就业面等指标,进行相关系数的分析。根据表 4-6,在调查的总体中,家庭人口与家庭就业面(即家庭中就业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均呈现强相关性,其中家庭就业面与家庭人均收入的相关系数达 0.56。同时,家庭人口与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的相关系数达到-0.58,说明居住的状况与家庭人口也有密切的关系。但在 B 组、C 组中,人口与居住面积的相关性很弱,说明居住极度困难的家庭,往往不是由于人口过多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从个人的因素来看,非农业户口、个人的残疾、重病,明显对个人和家庭收入有强烈的影响(见表 4-7)。其中“半边户”家庭的收入水平最低,收入的差异也不大。这与当前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以及非农人口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有很大关系。残疾人家庭和重病者家庭略好些,这往往是因为家庭与社会对他们有更多优先的救助形式,能保障他们不落入极度的贫困状况。除却以上因素,个人的失业、在业低收入也会造成家庭收入水平的低下。其中以长期失业人员、双下岗家庭生活最为艰难。然而,下岗和内退者的家庭收入差异较大,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素质或劳动技能的下岗人员仍可以获得就业机会,维持家庭的生活

水平。

表 4-6 家庭的致贫因素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

		家庭人均收入	人均居住面积
全部	家庭就业面	0.56	-0.04
	家庭人口	-0.27	-0.58
A 组	家庭就业面	0.43	-0.26
	家庭人口	-0.29	-0.62
B 组	家庭就业面	0.72	0.02
	家庭人口	-0.33	-0.02
C 组	家庭就业面	0.63	-0.10
	家庭人口	-0.29	-0.02

表 4-7 个人的致贫因素分析

	家庭人均收入 (元)		人均居住面积 (米 ²)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中有“农转工”	188.7	80.2	7.5	3.7	13
残疾者	213.7	110.4	10.9	6.7	13
重病患者	224.1	63.8	13.1	5.8	12
下岗者	261.3	228.3	10.4	6.2	37
双下岗	237.1	66.5	13.2	7.1	14
提前退休者	686.7	494.2	15.5	7.8	5
长期无业者	218.3	91.6	13.0	9.0	37

4.3 城市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城市的贫困者和家庭,收入与消费水平也会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贫困阶层的消费以食物消费为主,重点满足物质生活需求,对精神生活虽然也很重视,但是经济条件的制约决定了这是一种相对匮乏、未得到满足的生活方式。

4.3.1 城市贫困阶层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调查中了解到, A 组收入贫困阶层的家庭收入为 642 元/月,食物支出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达到了 71.8% (见图 4-6)。除了日常开支,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医疗、子女教育和储蓄等方面。A 组中,43.6%的家庭表示没有节余、或除日常开支,没有其他用途,34.5%的家庭表示用于子女教育,12.7%的家庭主要用于医疗,仅 5.5%的家庭主要考虑储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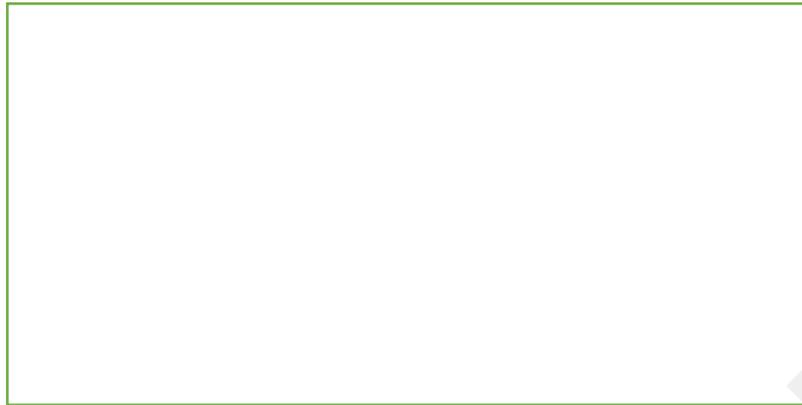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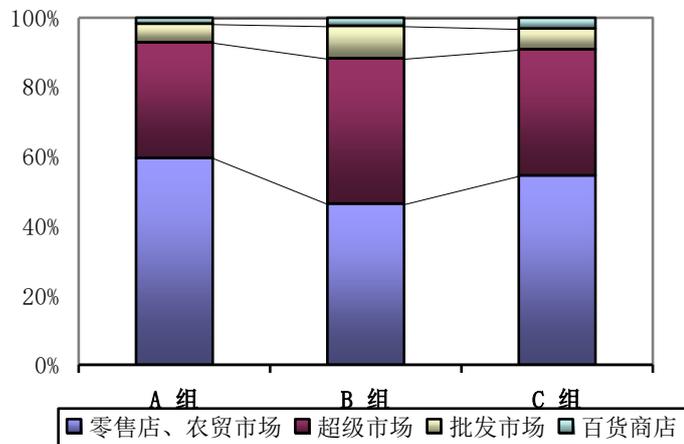
图 4-6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消费支出状况

4.3.2 城市贫困阶层的购物与娱乐

在购物地点的选择上，贫困阶层大部分只在社区内的零售店和农贸市场购物，部分首选去社区外的超级市场或批发市场购物（见图 4-7），一些生活极度贫困个人或家庭，甚至表示多年未去过新街口、山西路等城市商业中心。在城市中心及周边一些社区建设比较齐全、服务设施完善的大型居住区内，如笔者调查的玄武区的锁金六村、下关区的五所村，贫困者和家庭往往可以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也更加倾向于在合理的步行范围内，选择价格实惠的超市进行购物。但是在传统零售商业发达的老城区，如城南的秦淮、建邺区，贫困者和家庭一般在社区内的零售网点消费。在城市边缘地区，由于区位和交通的影响，仅有部分有条件的家庭，会选择社区外的大型超市、或批发市场购物。

在仅能维持温饱的经济条件下，贫困家庭的娱乐方式与活动空间十分有限，绝大部分局限在家庭内部、和社区绿地、公园内。针对是否外出游玩的问题，A 组，即收入贫困组中，仅有 5.1%的个人表示过去一年内曾携全家、或独自去城市主要公园、旅游景点游玩，其余 94.9%表示多年未外出游玩，原因在于无法担负公园、景点的有关费用。此外部分贫困家庭社交联系不广，缺乏出行的动机，也是重要原因。

图 4-7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购物场所选择



4.4 城市贫困阶层的居住状况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除了部分居住在城市中心的贫困者，以及一些因下放回宁集体安置住房的贫困者，大部分贫困阶层的居住条件比较差，在城南和下关的旧城区，和城市的边缘地区，贫困阶层的居住大多是成片的，具有“棚户区”的特点。

4.4.1 居住水平

从住房的类型和质量看，贫困阶层的住房 50%以上为平房，40%以上为质量较差或很差的平房，其余大部分居住在一般或较差的中低层楼房，调查对象中未发现居住在别墅或高层楼房的。另有 5%以上贫困者居住在“其它”类的住房，即等级以外的自搭建的棚屋、坯房或过渡房。

从居住面积看，B、C 组的居住水平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 10.4 平方米/人，而且住房内的设施条件十分落后。在 C 组收入住房双重贫困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仅有 6.86 平方米，只有 16.7%的家庭有管道煤气，20%的家庭有卫生间。

从住房来源看，贫困阶层的住房绝大多数是房管部门的公房，以及家传的私房。贫困阶层中单位分房、自购商品房和自购福利房的比例很低，可见大部分贫困者不具备单位分房的能力，也不具备购房的一般经济条件。

表 4-8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住房类型 (%)

	别墅住宅	高层楼房	很好的中低层楼房	一般的中低层楼房	较差的中低层楼房	较好的平房	一般的平房	较差的平房	很差的平房	其它
A 组	0	0	1.9	20.8	17.0	0	11.3	28.3	15.1	5.6
B 组	0	0	0	10.8	13.5	0	10.9	27.0	29.7	8.1
C 组	0	0	0	13.3	16.7	0	10.0	30.0	23.3	6.7

表 4-9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住房面积和设施

	平均面积 (平方米)	有卫生间 (%)	有管道煤气 (%)
A 组	10.19	32.1	15.1
B 组	6.79	16.2	16.2
C 组	6.86	20.0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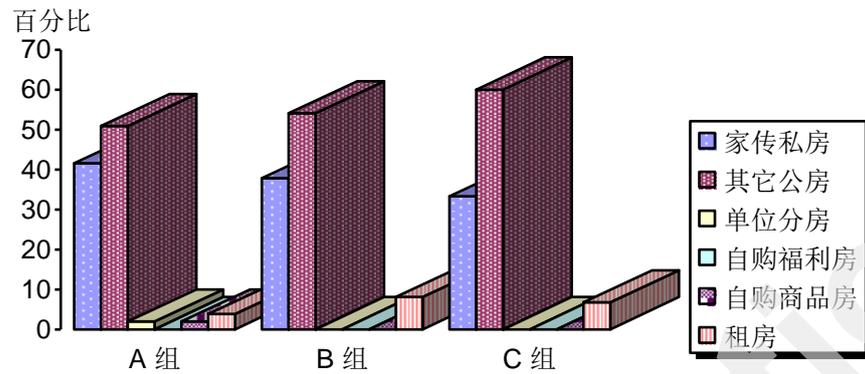


图4-8 南京市贫困阶层的住房来源

4.4.2 居住需求

贫困阶层的居住状况较差，住房内往往缺乏应有的基础设施，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能力主动搬迁，但仍希望改善现有的居住条件。在被调查者中，24.4%明确表示希望获得搬迁机会，同时又表现出对购房的经济上的担忧，33.3%表示无所谓，42.3%不愿意或没考虑过搬迁。对于搬迁后居住区位的选择，55.1%的人表示希望能够留在本街区，或本城区范围，其中以老城区的老年人居多，因为他们对现在的居住环境十分熟悉，也觉十分便利，另一方面，他们对在区外，或城市边缘区、郊区购房居住不甚了解。中青年人对居住区位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更加关心拆迁补偿费用，能否获得拆迁安置等具体问题。

4.4.3 居住典型地区

1、旧城区的贫困阶层

地点 安品街---评事街

这是城南传统商业区的一条南北向的老街，位于升州路与筮桥之间。旧时是皮货摊贩市场，称为皮市街，后讹传为评事街。从沿街出租店铺看，与其它位于闹市的普通小巷没有区别，然而每走进其中的一个门，就会发现，这里密密匝匝地住着数十户人家，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周围现代商业活动氛围的反差极大。



图 4-9 晚清时期的评事街

从内部格局看，评事街的住宅仍保留晚清特色，为五至六进的穿堂式结构，少数还保留了店面。也正是这种格局，造成内部居住异常密集。当地居民极少数是这些住宅的主人，大部分是解放后城市私有住房改造后，由房管所分配而迁入的住户。他们大多是下岗、退休的中老年人，或收入较低、没有住房的中青年人。

由于居住紧张（户均 15-20 平方米），几乎每户都自搭阁楼，两代人同处一室，分住阁楼上下，已是评事街人家的寻常景象。虽然居住条件很差，当地大部分居民却不愿搬迁，因为习惯了老屋和老街坊，而且地区交通便利，商业较发达，此外，户均住房面积很小，拆迁补偿费用低，无力购买商品房的也是重要原因。

2、城市中心的贫困阶层

地点 梅园新村---梅园

位于玄武区的梅园社区，南起中山东路，北至大悲巷，西抵汉府街，东达黄埔路。梅园曾是居住高度分异的地区，解放前的国府路（即现在的汉府街）两侧，既分布着政府官邸，也散布着外来人口的棚户，其中北侧的梅园、雍园地区是政府高级官员居住区，南侧为中南银行和中央医院的公寓住宅区，梅园以东则是贫民区。

现当地居住面貌仍比较混杂，贫困阶层大多居住在两类地区。一类是始建于 30 年代的梅园新村的历史建筑，为两层单元式砖券结构，解放后由房管部门分配给地方单位的职工（见图）。另一些贫困家庭居住在原贫民窟改造后的汉府新村、平爱村、东箭道等一层或二层的砖瓦结构房屋内，大多为家传私房，始建于 50 年代。



图 4-10 梅园新村的住宅

解放前，汉府新村、平爱村等地，是临近政府机关的广场休闲地带，有相当多的各类谋生者聚居此地。现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大部分居民都希望搬迁。

梅园新村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住宅区，其中 17 号、35 号、30 号为革命遗址，近期没有拆迁的可能。现房屋内部结构相当陈旧、住房面积狭小，居民大



图 4-11 梅园 11 号内的一家三口，和年久失修的 10 平方米小屋。

多希望搬迁。贫困家庭考虑到无力购房，搬迁的意愿较弱，但房屋质量每况愈下，经常性的房屋维修费用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沉重负担（见图 4-11）。

3、 城市边缘区的贫困阶层

地点 1 中华门外--西街、下码头

秦淮区的中华门街道位于城郊结合地带，是城市贫困阶层和流动人口集聚的地区。其中西街、下码头、路字铺等地贫困人口密集，居住环境较差。

西街是中华门外的一条老街，自东向西延伸数百米，共有约 2000 户人家，其中大约 80% 为一层或小二层的平房。这些平房始建于 20 世纪初，经过 80 年代的简单翻修而延续至今，绝大部分为家传私房。西街位于秦淮河南岸，城墙边缘，历史上曾经是外来劳工的聚居地，他们大多来自苏北地区，在秦淮河沿岸做过搬运工或船工，并定居在此地。现相当一部分居民已居住三代以上，房屋外观仍保存当年“青砖小瓦马头墙”的风貌，但内部结构已相当陈旧。此外，由于濒临秦淮河的支流玉带河，该地常年经受洪水淹没，房屋质量逐年下降。

西街贫困人口比例较高。全区社会保障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3 倍，主要特征是无劳保的老年人、重病患者、无业人员和家庭负担过重的双下岗职工。其中一些丧偶或鳏居的高龄老人，生活尤为无助。一位 70 多岁的老年妇女，由于早年丧偶，女儿因精神病离家出走，多年来仅靠拾捡垃圾和做临时工人来维持生活，生活最为艰难时，竟几个月未用过一度电。这样的生活状况在西街并不少见，在另一户父母均无业的家庭中，年仅 15 岁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在昏暗中读书写字。



图 4-12 西街的街景

下码头是中华门外另一处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该地位于玉带河与秦淮河交界处，清代曾是装卸粮食的码头，后逐渐被废弃。50年代，该地住宅大多为简易的茅草棚，居民为解放前由苏北逃荒而来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下放人员返城掀起了当地翻建扩建住宅的高潮，现住宅97%为一层多间或二层的砖木结构私房，建筑质量较差，外观混杂。与西街相类似，当地老年人比例较高，其次是下放回城的人员及其子女占多数。由于临近中华门劳务市场，对外交通便捷，该地区也为季节性的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提供廉价住房，社区环境异常萧条。当地贫困阶层主要由孤寡老人、长期无业的下放人员后代、及其农村配偶或子女构成。现1700户中有30户接受社会保障，比例高达1.8%。

地点2 中山桥—宝善街、南通路

下关区的中山桥，位于中山码头以东，惠民河以西地区。五十年代时，当地还是大片的黄泥塘，随着工厂的兴建，大批船民的下野，宝善街、九家圩一带的房屋逐渐增加，并形成了较完整的传统里弄格局。与中华门不同，当地居民很多是早年的船民或商人的后代，现当地仍有浓厚的商业氛围，社区环境比较活跃，沿街有四十余家店铺。现全社区住房80%为家传私房或早年在单位贷款下自建的平房。

当地现有70%家庭有下岗人员，大约40%为双下岗，社会保障的比例达到2.7%。下岗人员中相当一部分选择在乡镇企业打工，少部分在当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在人口外迁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外来人口迁入社区，从事各类经营及服务活动，目前暂住人口比例达10%左右。与中华门地区相似，宝善的老年人比例很高，尤其是丧偶又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只有依靠社会保障生存。

4、特殊的贫困阶层

地点 钓鱼台—荷花塘

自“门东”地区实施旧城改造，南京城内的传统民居正在急剧减少。位于中华门西侧即“门西”的钓鱼台街道，是现存的传统民居最为密集的地区，仅0.96平方公里内，居住12800多户人家，其中60%以上住房为明清遗留建筑，居住格局仍然保留晚清特色。此外，门西地区的突出特点是，低收入家庭和残疾人数众多，100户中大约有7户为残疾人家庭。隶属钓鱼台的荷花塘社区，拥有高达1.7%的社会保障比例，是贫困阶层高度集中的地区。据社区统计，当地1600户人家，近50%的家庭有下岗人员，20%为双下岗，5%家庭有无业人员，2%为残疾人家庭。另有6%的家庭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组成的“半家户”。

由于残疾人比例较高，当地有近300户从事“三小车”运输业，就业极不稳定。此外，残疾者的配偶多为残疾或农村户口，特殊的家庭结构下，易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图 4-13 荷花塘 4 号——五进穿堂的老宅，内住 10 户人家。

五、南京城市贫困阶层产生的背景与社会机制

5.1、南京城市历史与社会经济背景分析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

5.1.1、城市历史背景

1、人口背景

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曾经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旧中国的城市，由于阶级剥削、经济不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导致城市许多下层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下，并且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游民、乞丐和失业者。这些人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态，构成城市的贫困阶层。据有关历史资料，1934年，南京市无业人口逾26万，占总人口的35.8%（见表5-1）。1949年初，全市103万人口中，无业和失业人员达37万。

表 5-1 1934 年南京市无业人口统计（按比重顺序）

类别	人数	占总人口比重 (%)
老弱残废	159434	21.51
学生	51616	6.69
失业	12367	1.67
依财产生活	12359	1.67
机关收容	2362	0.32
囚犯	2089	0.28
非法生活	1066	0.14
其它	26208	3.54
合计	265501	35.82

资料来源：叶楚伦、柳征主编《首都志》卷六《户口》。

2、住宅建设背景

明清时代，居民住房和工商业房屋多数分布在城南的秦淮河和清溪两岸，都是传统的砖木结构或简易的草房棚屋。1899年下关正式辟为商埠，沪宁铁路通车，下关建起火车站和江边码头，市面逐渐繁荣。国民定都南京后，制订“首都建设计划”，将南京分为政治、工业、商业、文教、住宅等区，以城北为重点开发地带，开辟了新街口商业区和颐和路住宅区。一时间，新式住宅和简易棚屋的数量同时增长，古老破旧的城南房屋和新型的城北房屋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居住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贫富悬殊。

1949年解放时，城市居民大部分居住在城南的门东、门西，以及城中的白下路、洪武路、建邺路、北门桥一带的明清遗留的老式住房。20余万的城市贫民则栖居在玄武区的演武厅、虹板桥、晒布厂、沙塘园、汉府新村，白下区的五老村、广艺街、龙王庙，秦淮区的双乐园、建邺区的宫后山、冶山道院，鼓楼区的上海路、牌楼巷、驴子巷，下关区的小桃园、五所村等地的棚户区内。棚户房用芦席、油毡或铁皮搭盖，上无梁柱、下无基础、室内阴暗潮湿，极易倒塌。棚户区内更是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极差。据统计，旧南京留下的城镇房屋

只有 1184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房 743 万平方米。全城 309 处棚户区，占地约 83 万平方米，平均每户建筑面积只有 10.5-12 平方米，建筑密度却达 60%。

棚户区的改造始于五十年代，首先从一些居住条件极差的地区开始。白下区的五老村率先拆除棚屋，建造了一批砖木结构平房。解放后至 70 年代后期，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下，城市住房建设滞后，新建居住用房很少，而原有居住用地又部分改作生产、教育等其他用途，居住紧张的状况持续了很久。直至八十年代初，市政府提出“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相结合，以旧城改造为主”的政策，房屋建设才被真正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在大规模的成片改造下，南京的棚户区逐渐消逝，城市的居住状况得到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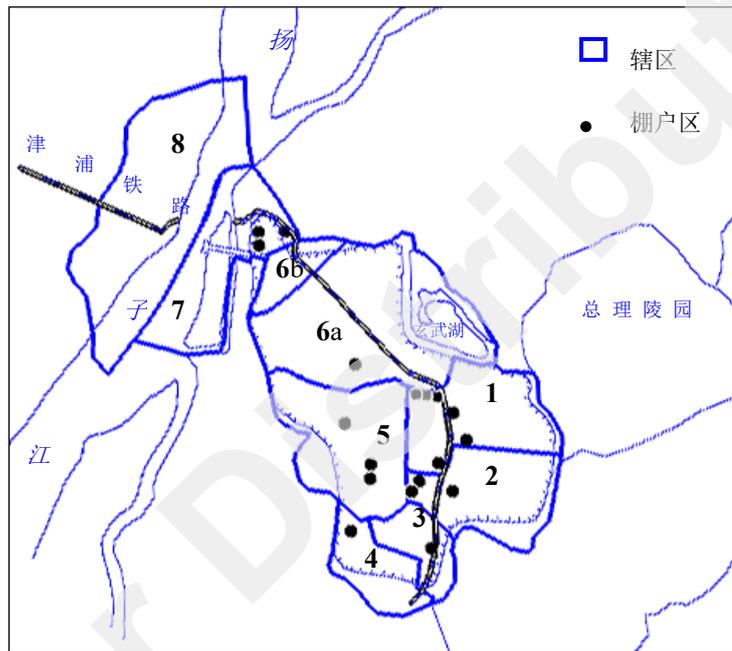


图 5-1 解放前南京市棚户区分布

(根据 1937 年区划范围图，1948 年南京市街道详图绘制)

表 5-2 解放前南京市住宅分异状况

辖区号	地区	花园洋房 (幢)	宫殿式 房屋 (幢)	新村	公寓	里弄房 屋	一般住 宅	棚户 (户)	
1	城中	174	2	146 幢	280 幢	422 间	64300 间	3240	
2	城南	96	10	1910 户	829 幢	3860 间	75600 间	5600	
3	城南	7	2			36 幢	6000 幢	335	
4									
5	城中	4271		4400 户	600 户	3379 户	16553 户	4304	
6	6a	城北	9265	25	4228 户	400 户	632 间	8388 户	565
	6b	城北	12				65 间	2356 间	486
7	下关区					200 间	23200 间	4522	
	总计	13825	39					19052	

资料来源：南京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南京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志》，1994 年

5.1.2、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

七十年代以来，南京市的人口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1-1977 年，解放初的人口增长得到初步控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下降了 11.26 和 11.95 个千分点。1978-1979 两年，大批知青、干部和居民返城，两年迁入城市的人口达 21.48 万，加上人口自然增长，共增人口 26.13 万，形成人口增长的高潮。1980-1989 年，人口的增长势头有所控制，但城市育龄人数增加，流动人口日益增多，造成人口的持续增长。90 年代以后，人口增长逐渐稳定。

表 5-3 南京市历年人口增长

年份	非农人口	农业人口	自然增长率%
1978	156.4	256.0	8.84
1979	176.9	252.4	9.05
1980	183.3	252.5	8.08
1985	226.7	239.1	4.56
1990	236.2	265.6	9.18
1995	259.0	262.7	2.62
1999	287.0	250.4	2.01

资料来源：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2000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看，老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渐上升。2000 年老年人口比重接近 8.5%，人口类型已属典型的老年型。按劳动年龄人口为 15-64 岁人口分析，劳动年龄人口由 1982 年的 69.2% 上升到 2000 年的 76.1%。家庭结构逐渐向核心家庭过渡，2000 年家庭户均人口数为 2.92，比 1990 年的 3.44 人下降了 0.52 人。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多，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增加，也反映在就业结构的变动。1990 年四普资料显示，南京市从事第一产业人口比重为 39.9%，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 36.7%，第三产业比重为 23.4%。1995 年，三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32.1%，37.2% 和 30.7%。1999 年三产业就业人口分别达到 72.86 万人，94.74 万人，与 99.21 万人，见图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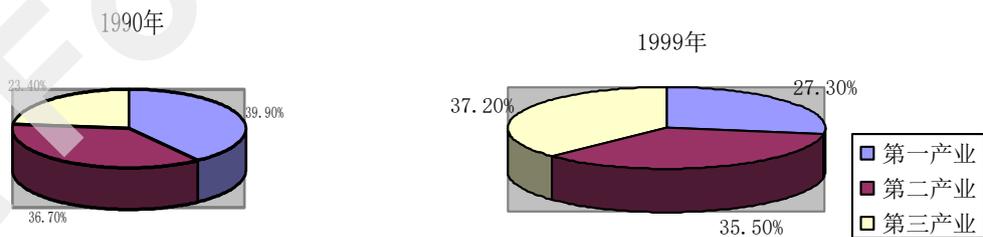


图 5-2 南京市人口就业结构变动 (1990-1999)

5.2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产生的社会机制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与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因素有关，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现象，正在向“社会型贫困”转变，城市贫困阶层更多具有“结构性贫困”的特征。

5.2.1 产业结构转型与失业下岗

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五十年代建立的，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落后。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在产业结构中比例上升，而很多国有、集体的企业却由于体制原因，经营状况急剧下降。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规律，随着一些行业的萎缩，企业的倒闭和裁员，必然会有大批的劳动者失业。

从南京目前的产业结构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达到 5.3: 48.4: 46.3。近十多年来，南京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当明显，尤其反映在第二产业部门。从表 5-4 可以看到，南京市近年工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尤以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下降速度最快。

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这一过程同时导致城市部分行业职工收入水平的相对降低，以及失业和下岗问题的增多。根据表 5-5 的数据，从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上看，南京市职工收入水平的降低，包括部分失业下岗问题，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地质勘探和水利、和商业餐饮业中。

表 5-4 1985、1996、1999 年南京市工业从业人员和职工人数的结构变动 (%)

	1985 年	1996 年			1999 年		
		制造业	采掘业	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	制造业	采掘业	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
从业人员百分比	36.6	33.0	0.3	0.8	26.4	0.3	0.7
职工人数百分比	69.0	45.7	0.7	1.6	38.8	0.7	1.7

资料来源：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1985；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1997；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2000。

表 5-5 南京市分行业职工收入情况

	1994 年	1999 年	1999 年为 1994 年的 %
所有行业平均	5865	10295	176
采掘业	4815*	7394*	154#
制造业	5243*	8621*	164#
水电煤气生产供应	9121	16432	180
建筑业	6430	9966*	155#
地质勘察、水利	6463	9302*	144#
交通、仓储、邮电	7144	13534	189
商业、餐饮业	5354*	8894*	166#
金融、险业	9546	18148	190
房地产业	7438	14023	189
社会服务业	5645*	11717	208

卫生、体育、福利	6159	11754	191
文教、艺术、影视	6388	11371	178
科研技术服务	7904	14701	186
党政、机关、社团	7113	14583	205

资料来源：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1995；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2000。

说明：* 表示低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表示低于所有行业平均增长率。

5.2.2 劳动力市场转变与城市流动人口压力

我国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正逐渐向劳动力市场模式转化。一方面，企业可以按照经济合理化原则，根据生产和经营所需的实际劳动力数量招收职工。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普遍冗员，对社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招工中出现对低素质、高成本劳动力的排斥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因企业获得招工自主权，基本失去了计划安排劳动力就业的渠道。总之，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低技术劳动力面临更大的就业困难。

与此同时，城乡壁垒的取消及户籍制度的淡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城市经济构成巨大的就业冲击，大大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一方面，一些传统产业或部门人满为患，另一方面，一些迅速发展的行业，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而农民工进入的建筑、餐饮、制衣、环卫等行业，具有不稳定性、劳动强度大、条件差等特点，是城市待业者宁肯待业也不愿从事的。

据统计，80年代初期，南京市流动人口仅10万人，至1987年增至27万，其间每年以4万人速度猛增。1990年南京市流动人口达50万规模，1999年市区暂住人口加上其他各类流动人口，总数达到70万的规模。1995年抽样调查显示，南京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省内以及安徽、浙江、四川等临近的省份。他们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其中，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占43%，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各占19%。这部分人口主要分布在秦淮河以西，老城墙以外的城市西南地段，例如建邺区的莫愁湖、南湖、止马营、兴隆，鼓楼区的江东，玄武区的孝陵卫。

这部分流动人口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返回农村务农，多数人可能成为新的城市居民。但他们并不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或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城市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或因农业规模化经营，而丧失了“土地的保障”，他们有可能成为城市贫困阶层的一部分，或形成“棚户区”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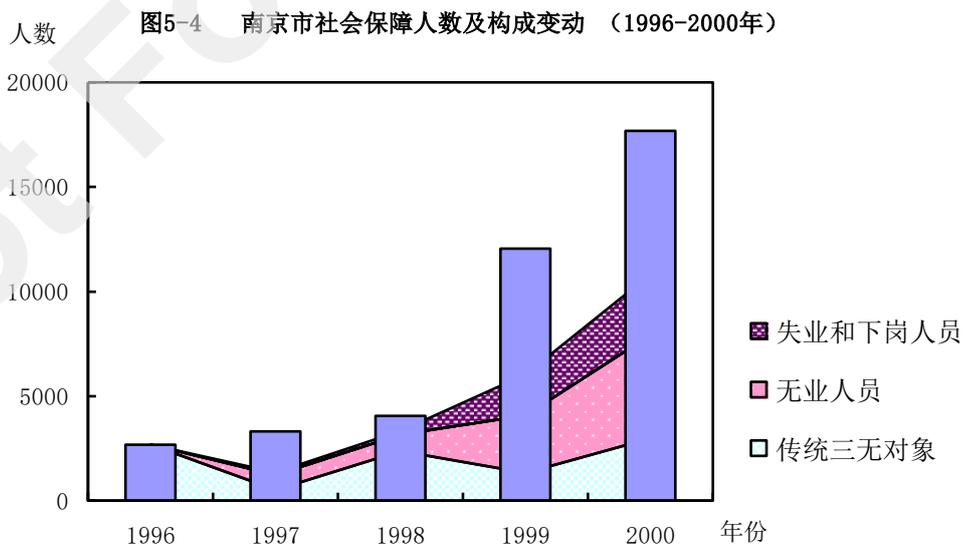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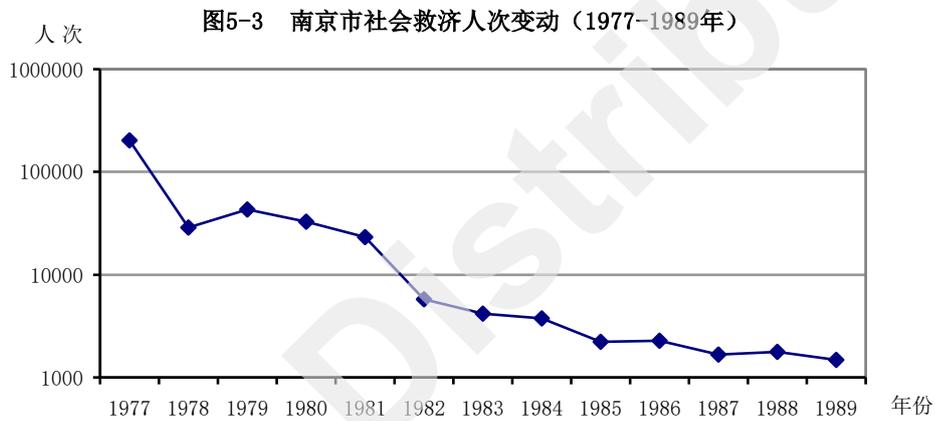
5.2.3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城市贫困的结构转化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政策基本上处于低层次的，具有明显的“两高一低”的特征，即高就业、高福利、低工资。其中，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主要是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绝对贫困对象，包括无劳动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的城镇孤老（简称“三无”对象）、社会困难户、60年代精简退休老职工，以及国家规定的一些特殊救济对象的定期定量救济和临时救济。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概念发生了变化。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步改革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企业原先承担的福利与保障的功能被逐步分

离出来，由企业、个人、与社会共同承担，例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一系列社会保险，企业支付职工的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或离退休费，由社会救济部门负责解决其家庭困难。其次，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将大批冗员推向社会，造成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失去就业的保障。可以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使原有对制度依赖比较严重，在市场经济下获得的机会又较少的国有企业员工，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也会因暂时失去工作，或家庭负担过重等原因，成为城市中的相对贫困者，需要政府给予其社会救助。

80年代以来，南京市救济人数逐年减少，城镇救济人数由1980年的三万余人次，下降为1989年的一千五百人次，仅占当年城镇人口的万分之六多。九十年代后期，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渐建立，成为最后一道“安全网”。1996年至2000年，南京市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逐年上升，其中，以孤寡老人为主的“三无”对象人数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比例在下降，而无业人员、失业和下岗人员的人数有显著的增长。在贫困群体逐渐扩大的情况下，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远远不能覆盖全部城市人口，部分弱势群体很容易陷入贫困。



六、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

城市贫困阶层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特殊产物，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也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分配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非均衡特征。如图 6-1 所示，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以及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居住空间结构、城市环境、消费结构、社会心理状况的差异性都存在作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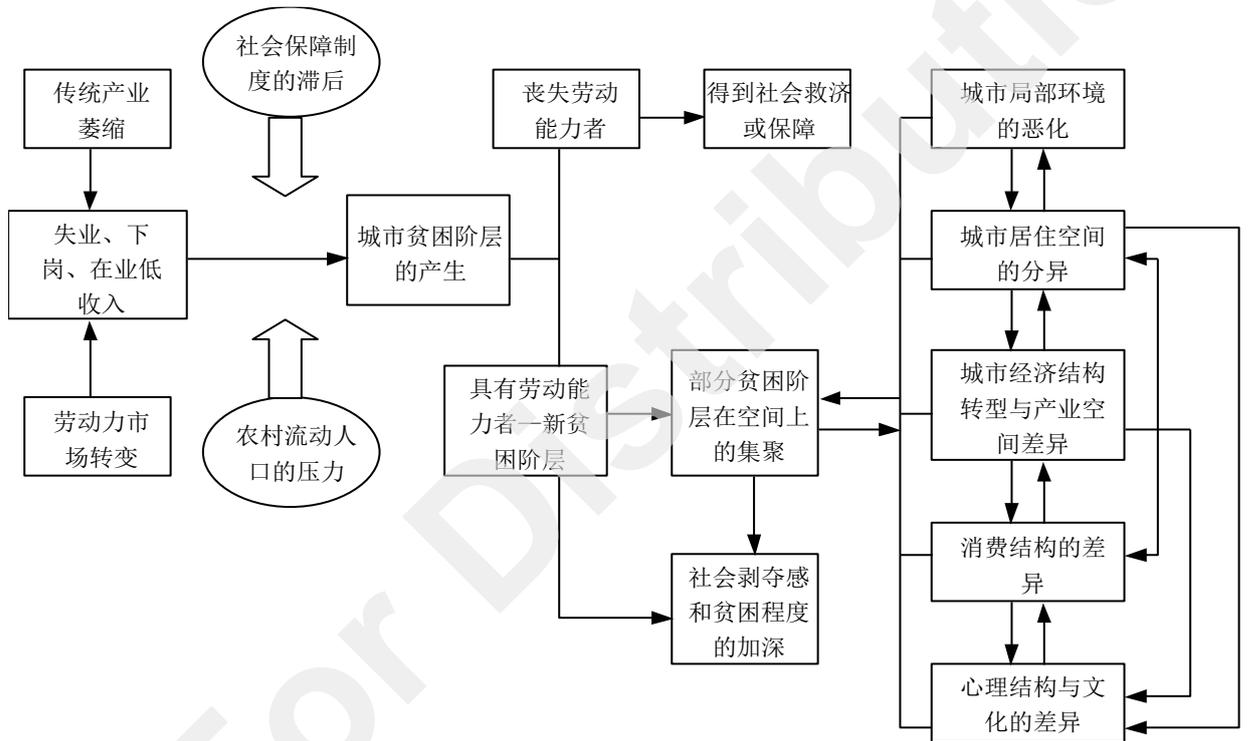


图 6-1 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相互作用示意图

6.1 城市贫困阶层与城市经济结构变迁

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与城市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失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非正规经济的产生，和城市产业用地结构的变迁上。

6.1.1 城市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在经济发展和人均 GNP 的特定水平上，拥有与之相适应的

产业结构，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的合理配置。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的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80%以上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工业部门。随着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会有大批劳动力从中转移出来，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对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劳动需求，降低失业率，有重要的作用。

在解决失业与再就业的矛盾中，个体和私营经济具有发展的必要性。曾有学者估计到 20 世纪末，我国劳动力资源达到 7.46 亿，约 1.53 亿人口面临失业的危险，失业率可能高达两位数。作为传统吸纳劳动力主要渠道的国有企业，即使保留一定劳动密集型份额，容纳劳动力的水平也将不断下降，而且自身还将向社会分流 2000 万富余工人。乡镇企业作为传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其吸纳能力也在减弱。因此，非公有经济成份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渠道。

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的修理业、餐饮业、服务业、农副产业、零售业中，个体私营经济占了 50-80%。从图 6-2 的就业比例来看，南京目前的个私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社会服务、交通运输、和工业等行业。商业餐饮业中个私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最高，为 61.9%。其次是社会服务业，达到 43.8%。社会服务中比重最高的是娱乐服务业，达到 85.8%，从事个体和私营修理业的人数也很多，约占该行业从业人数的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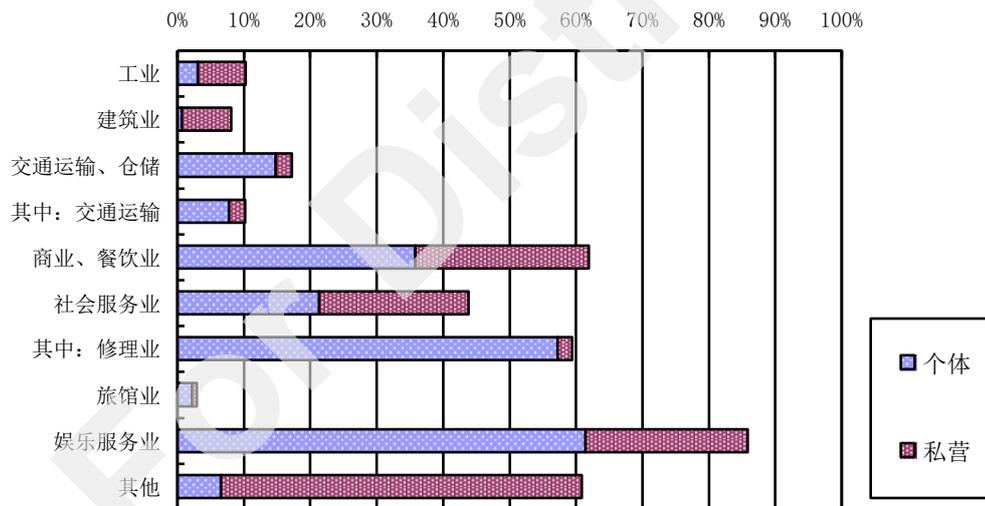


图 6-2 南京私营、个体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1999 年)

6.1.2 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产生

当前的城市贫困阶层，部分是丧失劳动力的个人，部分是具备劳动力的失业或在业低收入群体，后者类似于国外结构性失业导致的“新贫困阶层”，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一，受教育程度不高，在就业市场中基本处于劣势。根据近期对上海、南京等十市一县下岗再就业人员的调查，属于“有工作的穷人”大约占调查总数的 13.4%，他们是位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在业者。这部分下岗再就业者 88.5% 转向第三产业，9.6 % 继续从事加工制造业。受雇就业的占 51.3%，自营就业（或自谋职业）的占 48.7%。受雇者具有相对稳定劳动关系的仅占

6.8%，其余大部分从事临时工、劳务工、季节工、小时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¹⁰。

依据西方学者的研究，非正规就业可以分三种类型，包括家庭内部的工作、社区内的非正规就业，以及一些非法的地下经济。从西方城市发展看，非正规就业领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和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充当了吸纳低成本劳动力，减缓失业危机的社会经济缓冲区。

6.1.3 城市产业用地结构变迁

解放前，南京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据 1949 年统计，市区仅官僚资本企业 38 家，规模很小，私营企业 888 家，其中工厂仅 36 家，其余均为小手工作坊。从城市用地结构看，工业用地仅占 1.19%。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作为国家重点工业基地，南京城区周围逐渐出现各类工业区，形成北郊迈皋桥、尧化、栖霞，东南光华门，南郊雨花、板桥、西善桥等工业用地。

根据 1991 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南京的第二产业逐步向外围城镇拓展，主城范围内，除中央门外的机械、电子工业区，燕子矶的精细化工区予以保留，旧城区和下关区的工业用地将逐步搬迁或向其他用地性质转化。伴随城区工业用地性质的转变，城区的市属、区属、街道企业大幅度减少，居住、道路、绿化用地显著上升。九十年代，旧城区的居住用地增长很快，至 1999 年底，南京旧城区范围内居住用地达到 3905.3 公顷，是 1978 年旧城范围内居住用地的 1.89 倍。相比之下，城市金融、贸易、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用地增长比较缓慢，旧城区内居住用地的过度膨胀，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难度。

6.2 城市贫困阶层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形成

6.2.1 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

历史上，南京曾是居住严重分化的城市，畸形的消费、行政干预因素造成社会分层的显著差异，和各阶层居住的隔离分化。解放前城市贫民主要居住在中华门内两侧，外来贫困人口散布在秦淮河和小铁路沿线，富裕阶层居住在城北地区。

随着解放后私有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居住分异现象减弱，干部和工人等主要群体之间呈现居住融合的现象。自 1982 年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城市的用地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城市的中心区 CBD 建设、逆城市化阶段后的巨大的人口回迁压力，推动了城市居住由内城向城市边缘的迁移。按 1995 年城市总体规划的方向，城市的新建居住用地将向城东、城南延伸。在城市空间重组的过程中，重新出现了居住分异的现象。在城市中心区及其周边地带、和城市东部环境优美的地区，出现了高档公寓和高级别墅区。而在老城南、城西的部分地区、一些传统民居和街道由于城市建设滞后而逐渐衰落，成为老年人、下岗职工等城市低收入和贫困阶层的居住地带。在河西的部分中低收入层的住宅区边缘，和中华门外、下关等城市边缘区，由于外来人口尤其农民工的聚居，形成了各种独立的、或依附传统街区而存在的棚户区。

¹⁰ 见 '99 下岗职工再就业现状调查报告(节选)，中国经济时报，2000 年，10 月 2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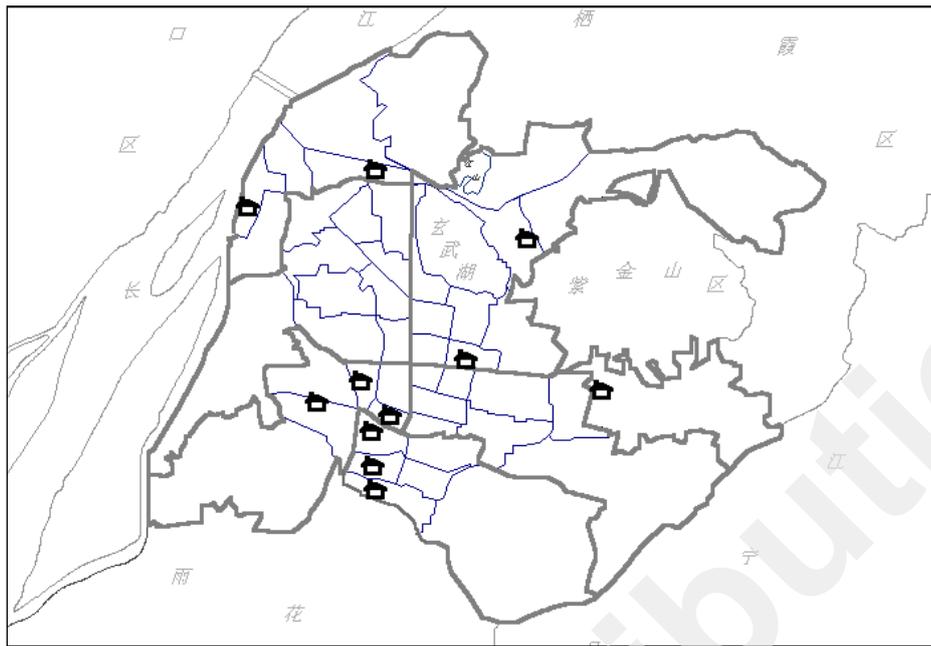


图 6-3 南京市低标准住宅与高级住宅区分布示意图¹¹

6.2.2 城市贫困阶层与传统居住空间的保留

明清时代，南京的传统民宅多为家连店、店连家单门独户的私人住宅，少数会馆形式的住宅是多户同住。至今保留的几处明清民宅，多为四进、五进，甚至七、八进的穿堂式结构。然而现存的传统住宅大多成为多户人家合住的大杂院，居住密集，配套设施不完善，房屋质量逐渐下降，部分甚至成为危房险房。这部分住宅分布在秦淮、建邺等区，集中在内秦淮河两侧，居民大多为早年搬入的附近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子女，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

根据南京市对传统居住区——门东、门西地区的调查，当地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人口密度过高，老龄化、下岗问题比较严重。土地利用和土地布局混乱，建筑质量普遍较差，一些传统民居老化严重。此外，建筑密度过高，基础设施不完善，排水、排污、排涝问题突出。

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传统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利用。如位于门西钓鱼台高岗里的“九十九间半”，是现存具有历史保存价值的传统民居，该院落内曾居住 67 户人家，居住拥挤，基础设施欠缺。九十年代经过修缮改造，该地较好地保存了原貌，也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现院内仅住 30 余户人家，且每户均配置了厨、卫设施。但仍有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街区或建筑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在门西、中华门外的部分老街区，一些会馆建筑已破旧不堪，既未得到适当的保护，逐渐丧失历史价值，也不能发挥居住的功能。

¹¹ 参见吴启焰，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以南京为例，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1999 年。



图 6-4 钓鱼台高岗里 17 号----“九十九间半”内景

6.3 城市局部环境的恶化与城市基础设施的结构完善

南京的地势是东北高、西南低，城区的清凉山、鼓楼岗、北极阁、富贵山横贯东西，自然形成以城南秦淮河，城北金川河水系为脉络的两大汇水区。自古以来，贫民大多居住在秦淮河口的地势低洼处。



图 6-5 评事街内简陋的排水系统

解放初期，内秦淮河、金川河、玄武湖淤积严重，城区内 30 年代遗留下来的 2000 多处水塘，已失去调蓄雨水的功能，排水管道的标准也偏低，大片路面易于积水。作为城市排水渠道的内秦淮河和金川河，两岸居住密度很大，这一带居民常年经受洪水灾害。其中，金川河弯曲段较多，河道淤塞而且水质污浊，主流经过的老金川门、四所村、晓街一带，河面非常狭窄，两岸住房密集，汛期淹水成片。据记载，金川门外的五所村，曾名鲁民村，是下关区的一棚户区，住房低矮简陋，排水设施极差，每逢金川河泛滥，居民住房常遭水淹。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秦淮、建邺、下关等区的部分地段，仍有相当多贫困阶层，居住在成片的非成套的平房或低洼易涝的地区。他们的居住条件恶劣，却无力搬出该地区，大部分只能借由市政建设改造的机会，获得搬迁的可能。居住环境恶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地势的影响、建筑布局的不合理、和道路系统的不完善，造成排水、抗洪涝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力的结果。以中华门为例，由于南玉带河泵站的设计失误，1998 年洪水期间，上码头地区 3000 多户人家遭淹浸，水位深可达膝。而下码头地区，由于建筑过分密集，街巷极不规则，狭窄到只能一至两人穿行，至今排水、排涝只能排至秦淮河内。

6.4 城市贫困阶层与地区消费结构的差异

城市居民的消费彼此间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其消费方式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表明

他们属于哪个收入阶层。对于富裕阶层，高档商品、奢侈品乃至一些工业耐用品如汽车、住房等，已进入主要消费领域，而对大部分中低收入层和贫困层，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食物、日常用品等仍旧是消费的主体。目前南京市总体消费水平看，居民消费正由生活消费型向投资增值型转变，从消费分层结构看，城市贫困阶层位于消费结构的最底层，仍以生活消费为主。

从消费的空间结构看，贫困阶层的非均匀分布形成了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由于收入的紧缩带来了消费的紧缩，在贫困阶层比较集中的社区，整体购买力不强，商业和零售业都不发达。以门西的钓鱼台街道为例，约 1 平方公里、13000 户居民的居住区范围内，仅有 10 余家各类国有或股份零售商店，50-60 家私营或个体零售点，后者月零售额仅 6 万余元。由于投入资金的有限，当地下岗职工和无业人员约 60% 选择半正规或非正规的农贸、小吃餐饮、零售业作为谋生方式，影响了地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形成低层次消费的循环模式。调查了解，境况略好的低收入家庭，大多乐意到居住区外的批发市场或超级市场购物，但由于平均出行距离较远，最近的连锁便利店也须步行 1000 米，贫困家庭无力支付交通费用，往往就近选择社区内的个体零售店，购买价格略高的商品。

6.5 城市贫困阶层与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

广义的贫困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困难，也指文化生活的匮乏以及身心健康状况不良等状况。当前城市贫困阶层，在社会行为至心理方面有逐渐凝固化的趋势，尤其贫困阶层较为集中的地区，一些群体性的意识逐渐凸现。

据 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全国 63 座城市的 2500 多居民的问卷调查，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80.8% 的人对“贫富差别”的状况感到不满，36.8% 的人认为这一差距将继续扩大。被调查者认为改革中受益最少的群体依次是下岗和失业者，以及务农民工¹²。有学者认为，调查结果并不能反映贫富差异的现实，而是反映了社会群体对社会公平的体会。

表 6-1 城市贫困阶层的心理结构差异

	城市中心地带	城市外缘地带
居住分散地区	具失落感，缺乏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感，具隐蔽性，有突发性行为。	个人流动性大，群体特征明显，行为特征明显。
居住稠密地区 (或传统街区)	对贫富差异体会深刻，具有一定进取心，具有自我与社会认同感。	对贫富差异体会较缓和，安于现状，具有自我与社会认同感，行为特征稳定。

在对南京贫困阶层的典型调查中发现，在贫困比例较高的社区，无论是普通居民或贫困者本身，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和消极怠惰的情绪。曾经就职于企事业单位的下岗人员，大多对当前社会的贫富差异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愿多谈，尤其女性和重病患者，对生活普遍缺乏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富差距明显，低收入群体分布较为分散的城市中心地带，贫困阶层有强烈的失落感，心理特征较为隐蔽。而在低收入

¹² 见汝信等主编，200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出版。

群体比较集中的城市边缘地带，和部分居住密集的老城区遗留地带，由于家庭和社区支撑体系作用，心理特征比较稳定，突发性行为较少。

此外，调查中发现，中青年的贫困家庭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们认为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是改善子女和家庭生活状况的最佳途径。但是贫富差异的扩大，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会减少贫困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机遇，从而导致这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恶性循环，形成相对固化的社会特征。

七、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发展政策的启示

城市贫困阶层是最需要社会关注的一部分人群。随着城市中部分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和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城市贫困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为城市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带来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政策、住宅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

7.1 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规划公平性的启示

19世纪现代规划形成的雏形期,也正是大城市人口膨胀、贫民区等城市社会问题涌现的时期。可以说,城市规划的创始者们实际上是一群社会改革家,他们关注如何改善城市的物质空间环境,以更好的实现社会公正。在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下,城市规划与管理体制逐渐完善,政府具有了较强的干预城市建设的能力。然而60年代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在西方社会的重现,公众开始怀疑政府能否继续作为社会公正的代表,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所谓“倡导式”规划理论,在这种思想下,规划者不仅仅是为政府服务,更重要的是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特别是为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服务。也就是说,城市规划逐渐由一种单纯的物质、技术手段,向物质与非物质结合的、有良好的、富有社会意义的社会促进手段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城市发展过程也变得难以控制,局部甚至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规划似乎越来越多的受到市场利益的引导,背离了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初衷。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是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西方国家从城市美化运动、城市规划、区划法的诞生,到公共住宅计划,无不在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如何让市场发挥其效应,同时保证社会公平、体现社会关怀的人本精神,尤其使低收入、贫困的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在城市发展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是我国城市规划者应当思考的问题。美国规划师提倡的建设高低标准住宅融合的社区,将城市交通规划与福利改革融合,为高失业地区人口提供便捷的交通,以获得更多就业机会等等实例¹³,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借鉴的。

7.2 城市贫困阶层对城市住宅政策的启示

城市贫困阶层和城市低标准住宅是当前许多国家关注的问题。在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采取的对策有所不同。欧洲福利国家一般通过制定国家范围的规划体系,参与公共住宅,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并且采取财政缩减政策,以住房补贴、低息贷款、按揭担保等各种形式鼓励人们购买住房。例如比利时的住房政策有三个基本出发点,即鼓励住宅所有权,为低收入者提供低租房屋,改善房屋质量。荷兰更是在1901年颁布了住宅法案,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住房条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福利住房。发展中国家更多通过贴息、减税等手段鼓励非盈利机构和民间的住房建设投资,例如南非的一些大城市采取NGO、政府和开发商的协作

¹³ 参见 张庭伟, 城市的双重性和规划理论问题, 城市规划, 2001年第25卷第1期。

方式，解决棚户区的用地置换和住房安置。

我国目前有 450 万户住房困难户，人均住房面积在 4 平方米以下。据有关资料，1995 年末至 1996 年，南京市以特殊安置、安居工程、旧城改造和单位调剂等方式，先后解决了对人均居住面积 2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特困户、人均 4 平方米以下的 13000 户特困家庭的住房问题。按 2000 年南京市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每平方米 2910 元，一套二居室商品房售价高达二、三十万元，中等收入家庭需积累几十年才能有购房能力，更毋庸提及贫困家庭。目前南京城市中心的一类、二类地区，城西的河西、城南郊的江宁等地区，空置商品房积压 90.87 万平方米，空置率达 13.1%，其中住宅积压 71.14 万平方米，占总空置面积的 3/4 以上。另一方面，仅有少部分低收入家庭能够购置福利房或安居房，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贫困家庭则根本无力自主解决住房问题。（见表 7-1）

表 7-1 城市居民获得住房的途径

获得住房的途径	主要受益者
1、原有的福利性分房	机关团体和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职工
2、福利性购房	同上
3、单位购买商品房分配或出租	经济效益好的企业
4、个人自购商品房	中高收入家庭
5、安居房	中低收入家庭和部分公务员、教师
6、政府“平改”“危改”工程	部分普通城市居民（包括部分贫困家庭）
7、集资建房、合作建房	部分企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经济条件的职工
8、租用商品房或私人住房	城市中经济条件好的人员和外来人员

资料来源：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7.3 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启示

关于社会保障的概念，最早即是针对社会贫困群体而提出的。1935 年美国制定的《社会保障法案》认为，社会保障的对象是“因年老、长期残废、死亡，或失业而失掉工资收入者”。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1941 年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认为，社会保障是指人民在失业、疾病、伤害、老年以及家主死亡、资薪中断时，予以生活经济的保障，并辅助其生育婚丧的意外费用。国内社会学者也认为社会保障的对象为受贫困威胁的部分公民及其家庭。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经济开放性与政府作用的扩大，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当一个社会及其社会成员面临更多外部风险，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必要的庇护与支撑。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二战前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21%，到九十年代中期，已增长到 47%。其中，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是相当显著的（见图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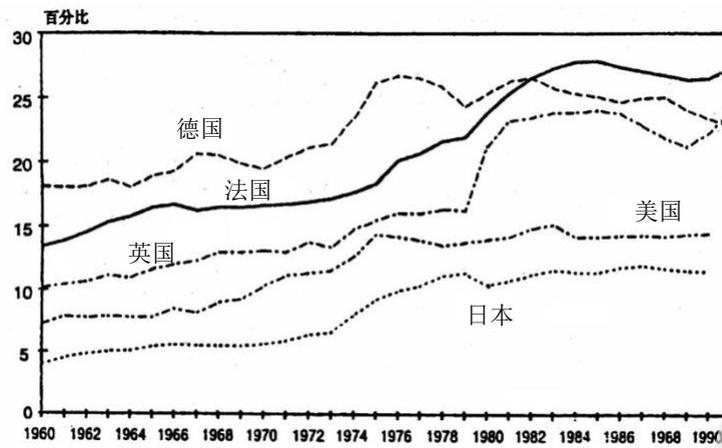


图 7-1 五个 OECD 成员国的社会保障支出
1960-1991 年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在我国，以家庭支撑为主的保障体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社会保障起步晚，发展比较缓慢。解放后我国的城市社会保障长期以单位为分割，直至 1993 年上海率先实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才逐渐形成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网络。自 1996 年 10 月正式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南京市的社会保障的规模和覆盖率均位居江苏省前列，但与全国的其他大城市相比仍比较落后。例如，上海市目前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为 280 元，保障人数 27.2 万，达到城镇总人口的 2.75%。而南京目前的保障对象 20074 人，仅占城镇总人口的 0.74%。目前主要问题为覆盖面窄，经费来源单一，以及给付标准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有赖于保障标准的合理确定，也有待于对居民实际收入的测量、保障资金的筹措和分担、社会保障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 [1] Badcock, Blair, 1984, *Unfairly Structured Cities*, Blackwell, Oxford.
- [2] Badcock, Blair, 1997, *Restructuring and spatial polarization in cit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1(2).
- [3] Bilton, Tony, etc., 1987, *Introductory Sociolog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Great Britain.
- [4] Blau, P. M. and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5] Booth, C., 1889,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William and Norgate, London.
- [6] Crankshaw, Owen and White, Caroline, 1995, *Racial Desegregation and Inner City Decay in Johannesbur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9.
- [7]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8] Silver, Hilary, 1993, *Na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9] Fainstein, Norman, 1993, *Race, Class and Segregation: Discourses about African Americ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10] Fainstein, Norman, 1996, *A Note on Interpreting American Poverty,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Blackwell, Oxford.
- [11] Gaffikin, Frank and Warf, Barney, 1993, *Urban Policy and the Post-Keynesian Stat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12] Gans, Herbert J., *The Use of Poverty: The Poor Pay All*, *Social Policy*, July-August, 1971.
- [13] Gans, Herbert J., 1972, *The Positive Functions of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2).
- [14] Gans, Herbert J., 1996, *From 'Underclass' to 'Undercaste':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 and its Major Victims*, In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Mingione, Enzo, Editor, Blackwell, Oxford.
- [15] Goodwin, Leonard, 1972, *Do the Poor Want to Work*, Brookings, Washington, D.C..
- [16] Greenstone, J. David, 1991, *Culture, Rationality, and the Underclass*,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7] Grusky, David B., Editor, 1994,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lass, Race and Gender*, Westview Press.
- [18]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Edward Arnold, London.
- [19] Holman, Robert, 1978, *Poverty: Explanations of Social Deprivation*, St. Martin's, New York.
- [20] Jargowsky, Paul A., 1997, *Poverty and Place: Ghettos, Barrios, and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21] Knox, Paul, 1982,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London and New York.

- [22] Ladanyi, Janos, 1993,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the Gypsy Minority in Budap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23] Lewis, Oscar, 196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19.
- [24] Marcuse, Peter, 1993, What's So New About Divided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25] Marcuse, Peter, 1996, Space and Race in the Post-Fordist City: the Outcast Ghetto and Advanced Home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n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Mingione, Enzo, Editor, Blackwell, Oxford.
- [26] Mincy, Ronald B., 1994, The Underclass: Concept, Controversy, and Evidence, In *Confronting Poverty: Prescriptions For Changes*, Sheldon H. Danziger, Gary D. Sandefur, and Daniel H. Weinberg., Edit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7] Mingione, Enzo, 1993, The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28] Mingione, Enzo and Morlicchio, Enrica, 1993, New Forms of Urban Poverty in Italy: Risk Path Model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29] Mingione, Enzo, 1996, Urban Poverty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World: Concepts, Analysis and Debates, In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Mingione, Enzo, Editor, Blackwell, Oxford.
- [30] Morris, L.D., 1993, Is There a British Under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 [31] Myrdal, G., 1963, *Challenge to Affluence*, Pantheon, New York.
- [32] Rocha, Sonia, 1995, Metropolitan Poverty in Brazil: Economic Cycles, Labour Market and Demographic Tre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9.
- [33] Rowntree, S.B.,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Macmillan, London.
- [34] Spencer, Metta, 1985, *Foundation of Modern Sociology*, Prentice-Hal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y Series, Alex Inkeles, Editor,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 [35] Stewart, Elbert W., 1983, *Social Problems In Modern America*, McCraw-Hill, New York.
- [36] Treadwell, David and Shaw, Gaylord, Underclass: How One Family Cope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5, 1981.
- [37] Wilson, W. J.,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blacks and changing Americ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 [38]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39] Yapa, Lakshman, 1996, What Causes Poverty?: A Postmodern View,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6(4).
- [40] Zajczyk, Francesca, 1996, The Social Morphology of the New Urban Poor in a Wealthy Italian City: the Case of Milan, In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Mingione, Enzo, Editor, Blackwell, Oxford.
- [41] (英)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42] (美) 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
- [43] (美) 戴维·波谱诺著,《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 [44] (日)一番ヶ瀬 康子,《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沈洁、赵军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 [45] 冯建,周一星等,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城市规划》,2001年第1期。
- [46] 刘义强,社会分层中的边缘群体及其游民化现象,《社会》,2000年第3期。
- [47]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48] 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49] 汝信等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50] 李若建,大城市低收入老人群体状况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2期。
- [51] 李培林、张翼,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 [52] 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
- [53] 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 [54] 宋林飞,《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55]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体制转换时期社会弱者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时事出版社,2000年。
- [56] 陈涌,城市贫困区位化趋势及其影响,《城市问题》,2000年第6期。
- [57] 汪雁、慈勤英,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滞后的探讨,《人口学刊》,2000年第6期。
- [58] 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59] 罗润东,《城市下岗失业及其治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 [60] 张妍,中国失业问题综述(1996-1999),《人口学刊》,2000年第1期。
- [61] 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 [62] 钟鸣,《两极鸿沟?当代中国的贫富阶层》,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 [63] 南京市民政局编,《南京市行政区划简册(2000)》。
- [64]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民政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
- [65]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建置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
- [66]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
- [67] 南京市统计局编,《南京统计年鉴2000》,
- [68] 南京市统计局编,《南京统计年鉴1997》
- [69] 南京市统计局编,《南京统计年鉴1995》
- [70] 南京市统计局编,《南京统计年鉴1985》
- [71] 南京市统计局、南京统计学会编,《奔向辉煌——南京改革开放二十年》,1998年。
- [72] 俞传尧,《社会保障理论与务实》,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 [73] 奚从清、沈贻方主编,《社会学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
- [74] 顾江,南京市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原因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 [75] 袁亚愚等著,《社会学家的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76] 唐忠新,《贫富分化的社会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 [77] 顾朝林,1994年,战后西方城市研究的学派,《地理学报》,Vol.49, No.4。
- [78] 顾朝林, M. Kestloot, 1997年,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地理学报》,Vol.52, No.5。
- [79] 徐巍、古国才、钟淮,南京市住宅建设五十年回顾与展望,《城市研究》,2000年第3期。

- [80] 董淑芬, 九十年代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动态》, 2000 年第 1 期。
- [81] 樊平, 《中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报告》, 选自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82] 樊平, 中国城镇的低收入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4 期。

Not For Distribution

[Redacted text block]

Not For Distribution

附录 1

南京市居民经济生活调查表

亲爱的女士/先生:

我们是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的科研人员,现承担相关的科研项目进行问卷调查,十分感谢您能配合我们的调查。

此致

敬礼!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二〇〇一年三月

(请在符合您情况的选项前的□内打√)

- 1、您的职业是_____
- A、工人
 - B、农民
 - C、领导干部
 - D、教师和科研人员
 - E、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 F、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 G、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 H、企业一般管理人员
 - I、商业工作者
 - J、服务业工作者
 - K、无正式职业
 - L、其他_____
- 2、您的单位性质_____
- A、国有企业
 - B、国有股份
 - C、集体
 - D、中外合资
 - E、外商独资
 - F、私营企业
 - G、乡镇企业
 - H、个体
 - I、其他
- 3、您单位经济效益_____
- A、效益很好
 - B、有些效益
 - C、基本持平
 - D、略有亏损
 - E、严重亏损
- 4、您的年龄_____岁
- A、15—25
 - B、26—35
 - C、35—45
 - D、46—60
 - E、61—70
 - F、71 以上
- 5、您_____
- A、已婚
 - B、未婚
- 6、您_____有子女
- A、是
 - B、否
- 7、您的性别_____
- A、男
 - B、女
- 8、您的文化程度_____
- A、未受过教育
 - B、小学
 - C、初中
 - D、高中
 - E、中专/中技/职高
 - F、大专
 - G、大学本科
 - H、研究生
- 9、您的住房是_____
- A、别墅式住宅
 - B、高层楼房
 - C、中低层楼房
 - D、平房
 - G、自搭建房
 - H、其他

- 10、您的住房_____
- A、质量很好
 - B、质量一般
 - C、质量较差
 - D、很差
 - E、等级以外
- 11、您的住房是_____
- A、 单位分配
 - B、 其他公房
 - C、 家传私房
 - D、 自购商品房
 - E、 自购福利房
 - F、 集资建房
 - G、 租房
 - H、 借房
 - I、 其他
- 12、您的住房面积_____平方米
- 13、您的住房有_____居室
- A、 1
 - B、 2
 - C、 3
 - D、 4
 - E、 4 以上
- 14、住房_____卫生间
- A、 有
 - B、 无
- 15、住房_____管道煤气
- A、有
 - B、无
- 16、您的家庭成员共_____位
- 17、家庭中有工作的共_____位
- 18、您的家庭每月收入_____
- 19、每月基本生活开销_____
- 20、每月用于购买食物的开销_____
- 21、除家庭日常开支，您的家庭收入主要用于_____
- A、没有其它
 - B、子女教育
 - C、医疗费用
 - D、储蓄或投资
 - E、其他
- 22、您家中_____电话
- A、有
 - B、无
- 23、您和您的家庭最近一次在外面饭店就餐是_____
- A、一个月内
 - B、一个月前
 - C、三个月前
 - D、半年以前
 - E、一年以前
 - F、记不清
- 24、您和您的家庭最近一次在外面游玩是_____
- A、一个月内
 - B、一个月前
 - C、三个月前
 - D、半年前
 - E、一年前
 - F、记不清
- 25、您和您的家庭平常娱乐主要_____
- A、基本无娱乐
 - B、逛街
 - C、逛公园
 - D、卡拉OK厅或舞厅
 - E、其他_____
- 26、您经常在_____购物
- A、街边零售店、农贸市场
 - B、批发市场
 - C、超市
 - D、百货商场
 - E、专卖店、高档购物中心
- 27、您是否以下之一_____
- A、失业人员
 - B、下岗人员
 - C、提前退休者
 - D、正常退休者
 - E、一直无正式工作
- 28、您目前_____
- A、全部或大部分时间在工作（每周工作三天以上）
 - B、一半或少部分时间在工作（每周工作三天以下）
 - C、基本上或完全没有工作

29、您是否领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_____

- A、是
- B、不是

30、您是否领取失业保险_____

- A、是
- B、不是

31、您或您的家庭是否领取社会救济或最低生活保障_____

- A、是
- B、不是

32、您是否_____

- A、非重病、残疾
- B、重病
- C、残疾

33、您是否_____非城市户口

- A、是
- B、否

34、您是否_____搬出本街区

- A、希望能够
- B、无所谓
- C、不希望

35、若可能拆迁，您是否_____在本街区购房居住

- A、希望能够
- B、无所谓
- C、不希望

附录 2 南京各城区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构成 (2000 年)

区	街道	接受最低保障的人数	其中						占非农人口百分比	类型
			三无对象%	无业%	失业人员%	下岗%	在职%	离退休%		
鼓楼区	华侨路	134	3.0	----	0.7	18.7	1.5	3.0	0.50	III
	五台山	165	2.4	----	0.6	16.4	3.6	3.0	0.33	II
	江东	99	2.0	----	2.0	13.1	6.1	2.0	0.20	I
	宁海路	140	5.0	----	0.7	15.7	0.0	5.0	0.28	II
	水佐岗	122	4.1	----	3.3	10.7	2.5	4.9	0.20	I
	湖南路	131	3.1	----	3.1	15.3	3.8	5.3	0.37	II
	三牌楼	157	3.2	----	1.9	12.7	3.2	5.1	0.28	II
	中央门	145	6.9	----	0.7	8.3	6.2	2.1	0.24	II
	鼓楼	112	6.3	----	1.8	10.7	5.4	0.9	0.28	II
挹江门	141	2.1	----	2.1	23.4	2.8	3.5	0.28	II	
玄武区	新街口	134	3.7	37.3	0.0	7.5	0.7	0.7	0.35	II
	丹凤	150	2.0	36.0	0.0	16.0	4.7	2.7	0.27	II
	玄武门	113	2.7	33.6	0.0	12.4	5.3	0.9	0.28	II
	兰园	63	4.8	55.5	1.6	7.9	3.2	1.6	0.20	I
	梅园	195	0.5	29.7	0.0	13.8	3.6	2.1	0.83	IV
	后宰门	90	4.4	22.2	5.5	14.4	11.1	1.1	0.21	I
	玄武湖	63	1.6	39.7	3.2	14.3	6.3	0.0	0.29	II
	锁金村	171	0.6	35.7	0.6	12.9	2.3	5.3	0.42	II
	红山	197	0.0	24.9	0.0	12.7	4.6	0.5	1.21	V
孝陵卫	55	3.6	18.2	0.0	18.2	3.6	1.8	0.09	I	
白下区	苜蓿园	41	0.0	22.0	2.4	26.8	2.4	0.0	0.32	II
	洪武路	181	0.0	26.0	0.0	21.0	3.9	3.9	0.39	II
	淮海路	36	0.0	44.4	0.0	11.1	19.4	0.0	0.16	I
	建康路	287	0.0	27.9	0.0	25.4	1.4	1.4	0.68	III
	瑞金路	95	0.0	40.0	0.0	17.9	7.4	0.0	0.18	I
	石门坎	146	0.0	43.2	0.0	8.2	6.8	2.1	0.71	III
	五老村	233	0.0	26.6	0.0	23.2	9.0	1.7	0.60	III
大光路	308	0.0	36.7	0.0	11.0	0.0	1.3	0.54	III	
秦淮区	夫子庙	193	4.7	39.9	0.5	7.3	3.6	3.1	0.48	III
	饮虹园	205	4.9	40.0	1.0	14.1	4.9	3.0	0.51	III
	钓鱼台	196	4.1	33.7	1.5	14.8	4.1	3.1	0.63	III
	双塘	315	1.3	26.0	0.3	22.5	6.0	1.6	0.61	III
	中华门	272	1.5	29.4	8.5	17.3	4.0	4.0	1.07	V
	秦虹	149	2.0	45.0	0.0	13.4	3.4	1.3	0.67	III
红花镇	67	1.5	43.2	0.0	10.4	3.0	4.5	0.53	III	
建邺区	朝天宫	231	4.3	39.0	0.0	12.1	1.7	0.0	0.47	II
	安品街	278	1.8	44.6	0.0	7.9	1.8	2.9	0.90	IV
	止马营	143	3.5	35.7	2.1	17.5	0.7	0.0	0.54	III
	莫愁湖	297	1.7	39.7	0.0	14.1	2.0	2.7	0.65	III
	南湖	352	5.1	32.1	0.9	16.5	0.6	1.1	0.68	III
兴隆	139	0.7	30.2	0.0	21.6	1.4	1.4	0.57	III	
下关区	热河南路	232	1.7		0.0	17.7	3.4	2.2	0.49	III
	中山桥	241	2.5		0.0	14.5	2.1	1.7	0.77	IV
	车站	117	6.8		0.0	18.8	4.3	1.7	0.35	II
	建宁路	156	0.6		0.0	14.7	4.5	2.6	0.34	II
	宝塔桥	281	2.8		0.0	11.4	2.5	4.3	0.69	III
小市	368	0.0		0.8	12.8	2.7	2.7	0.61	III	

附录 3 基本统计数据

Not For Distribution

南京各行业从业人员人数和个私经济从业人员比例

	个体	私营	其他	个私比例 (%)
农、林、牧、渔	390	616	16830	5.6
工业	22122	50881	640397	10.2
建筑业	628	7698	94612	7.8
交通运输、仓储	16990	2711	95148	17.2
其中：交通运输	8408	2489	92698	10.5
商业、餐饮业	139243	101365	147899	61.9
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	98431	95925	137074	58.6
社会服务业	26629	28084	70110	43.8
其中：修理业	7975	302	5649*	59.4
旅馆业	463	166	20878	2.9
娱乐服务业	1866	741	430	85.8
其他	1292	10766	7751	60.9